

陳

〇

竊國大盜袁世凱

MG
K827.52
26

竊大盜世

陳伯達 著

新華書店發行



3 2285 9832 6

毛澤東同志的『論聯合政府』說到近代中國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革命的民主派——孫中山先生，一個是竊國大盜的專制派——袁世凱。

袁世凱——他已死得將近三十年。但是，作爲一個政治的人，這個人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所時常接觸到的。他是死了，但是，他的思想的、政治的靈魂，却被他的後輩復活了。作爲一種政治的象徵來說，袁世凱在現實的政治中，仍然高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而由於發展的結果，現實的袁世凱，在手段的殘酷與陰毒上，終究遠遠地超過了已死的袁世凱。

袁世凱——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暗影。他並不是一個普通舊式的政治人物。袁世凱——這個政治人物是出現在近代中國維新與守舊、革命與反革命互相鬥爭的時代，在這種不平常的時代，反動派爲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來絞殺中國的前途，就鍛鍊出了一個這種不平常的人物。

袁世凱起初是由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李鴻章和滿清朝廷的實力派——榮祿所特別賞識的。李鴻章臨死時候，又向慈禧太后保薦他作爲自己的接替人，說是：『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一切反動派把他看成舊中國的支柱，想經過他來抵擋中

國人民對於舊中國的衝擊。爲什麼袁世凱這樣特別被一切反動派所垂青呢？因爲他在反對中國進步的事業和中國人民的事業上有特別的機智，特別的手腕，而在他的手裏還有一支反對中國人民的特別武裝力量。

袁世凱曾經做過維新派，參加過當時康有爲等人所組織的君主立憲的維新團體——強學會。康有爲等人當時代表一部份『開明』地主和一部份與大工業有若干聯系、而在政治上帶有若干自由主義色彩的大資產階級，其所進行的經過皇帝和少數貴族的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在當時雖然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這運動是脫離民衆、而且根本反對民衆參加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這種運動是不能在實際上解決任何歷史問題的運動，不但爲戊戌政變自身所證明，而且爲全部中國近代史所證明，關於這些，我不準備在這裏多說，我這裏要說的是關於袁世凱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戊戌維新運動之前，袁世凱雖則經過李鴻章與榮祿的賞識，得在小站練兵，但是，他在滿清朝廷的地位並不高。到了戊戌運動的時候，袁世凱因爲參加過強學會的機緣，經過維新派譚嗣同的保舉，就從光緒皇帝那裏（八月初一日被召見）取得了特賞侍郎專辦練兵事務的職務，就是說，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提升了自己在滿清朝廷中的地位。但是，重要的，還不是因此取得侍郎的地位；就袁世凱本人來說，這地位固然是升了一步，但在朝廷中來說，這地位並不是很高的。對於袁世凱，對於當時整個反維新派，重要的，就是袁世凱以維新派的關係，參加了當時關於維新派命運的計劃，這計劃：要當那集中滿清朝廷黑

暗統治的最後權威者——西太后準備於九月天津閱兵利用榮祿軍隊威脅廢立光緒帝的時候，袁世凱的軍隊起而保護光緒帝，並誅殺榮祿。袁世凱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答應充當維新派的主角，但在實際上，他在維新派這個計劃裏面，在他談好這個計劃之後，却馬上充當了反維新派的主角。他把全部計劃獻給反維新派，因而使反維新派得以把維新派納在血海裏面。當八月初三日譚嗣同和袁世凱進行這種與虎謀皮的計劃的時候，譚嗣同曾告訴袁世凱：如果袁世凱不願意幹的話，就請袁世凱到頤和園向西太后告密，把他舉發殺掉，可以得富貴。袁世凱正色厲聲說道：『你把我袁某當成怎樣的人呀？』但是，一日之間，正是袁世凱，不是別人，就向西太后和榮祿獻功，告發譚嗣同及其同伴的密謀，結果，百日維新運動（從四月到八月初）就像曇花一現。站在光緒皇帝背後虎視眈眈的西太后於八月初六日重新臨朝親政，把譚嗣同等人殺掉了，又把袁世凱當時所稱爲『曠代之聖主』的光緒皇帝關閉起來了。譚嗣同的話果然不錯，袁世凱就從此大富大貴了。插足維新派，轉過頭來，出賣維新派，這就是袁世凱第一次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所顯現的身手。這種兩面派的『機智』，兩面派的『手腕』，就是袁世凱特別的機智和特別的手腕之重要的組成，或者更正當地說，是其主要的組成。這種兩面派的作爲，使袁世凱在當時最黑暗的勢力中得到最大的愛寵。

戊戌政變之後，袁世凱的第二個拿手好戲，便是鎮壓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自發運動——義和團運動，而又對外按兵不動，觀望八國聯軍的侵略北京。這樣，袁世凱在

受中國內部反動派贊賞之後，又再加上受外國人的贊賞了。隨後他就得繼續李鴻章，担任了當時舉足輕重的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職任。

袁世凱的所以得在政治上進行大投機，大買賣，並經過這種投機的買賣，左宜右有，興妖作孽，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消說，是因為他有一種資本，這就是他在小站練兵時所弄起來的所謂『新建陸軍』。這是袁世凱可居的奇貨。在戊戌政變的時候，維新派的譚嗣同等所以特別要去結納他，就是因為他們是浮在天上，他們想依靠袁世凱帶領的軍隊去站住腳。不是依靠羣衆，而是依靠宮廷的陰謀，不是公開向人民羣衆求救，而是祕密向軍閥求救，這是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悲劇。袁世凱的得志正是利用了戊戌維新派這個弱點，把維新派引上釣鉤，而後來烹吃他們。在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外國人所以特別贊賞袁世凱，也就是因為他有一支帶有新式武器的軍隊，可以幫助外國人來血洗當時那種僅有原始武器或手無寸鐵的起義的羣衆。

小站練兵——這就是袁世凱給自己的政治買賣事業建立了力量的基礎。他從這裏開始組織了作爲竊國之用的北洋軍隊，培養了和團結了一大批竊國的爪牙（武的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占元、曹錕、段芝貴等；文的如徐世昌等），並造成了一種竊國的觀念——即所謂『北洋正統』。

以『新建陸軍』的力量爲體，以兩面派的手段爲用，袁世凱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得到中國的和外國的反動派的扶持，變成了近代中國的第一個竊國大盜。

辛亥革命，這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革命是人民歷來反對滿清朝廷所鬱積而大爆發的結果，革命的發展是很迅速的。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革命的活動地盤主要的是舊形式的民衆組織（會黨）和新軍，而這種會黨和新軍主要的是以農民大衆構成的。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的孫中山民主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原則），是這個革命的政治綱領，起了很積極的作用。可是革命有它的弱點。工人們英勇地參加鬥爭，但那時中國無產階級還弱小，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起義民衆的自覺性和組織性顯然是很不夠的。而且起義內部又是各種矛盾的結合。各階級是在反滿的目標上結合起來，除此以外，目標是絕不一致的。反滿的革命同盟會本身就是這樣矛盾的組織，辛亥革命本身更是這樣矛盾的革命。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太過軟弱，和民衆的結合太不足，並且不但不敢使人民勝利，乃至隨時可能把革命交給反革命，而小資產階級在反革命面前也不能形成堅決的獨立力量。原來一部份和大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和一部份『開明』的地主的君主立憲派因爲請願立憲沒有結果，對清廷絕望，挺而走險，競相附和於革命，在革命內部努力取得權力。各省區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原來統治勢力——許多舊軍閥舊官僚知道滿

清朝廷的命運不能久長（那時很多大官僚已預知滿清朝廷『皇靈之永不』），則紛紛掛起『革命』的旗幟，藉以企求避免真正的革命。清朝協統黎元洪從樓梯下暗藏處被起義的人拉出來，擁戴爲革命軍的第一個都督，象徵了這個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種革命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便被當時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最有力量的首領——袁世凱看穿了。袁世凱憑藉北洋軍隊的關係，乘滿清朝廷搖搖欲倒的機會，以保持滿清朝廷皇帝的姿態，很順利地把滿清朝廷玩弄於自己的手掌中，取得了滿清朝廷統治下的全部權力，同時又利用了北洋軍隊的力量給那武漢幼弱的革命軍一個嚴重的打擊，遂又停止軍隊行動，這樣一打一拉，一張一弛，以作爲軟化革命的張本。袁世凱的箭，一方面要射倒滿清朝廷，一方面要射倒革命。他對滿清朝廷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不能夠保護你。他又對革命方面這末說：你如果不給我全部權力，那末，我就能夠殺你。他命令北洋的軍隊打擊革命軍，這是同時告訴北方的滿清朝廷和南方的起義當局：他手裏是有力量的，兩方面都應該向他妥協，由他來『建設一堅固之政府』，由他來『統一中國』。當他的部下在漢陽打擊革命軍之後，他就任滿清朝廷內閣大臣的時候，就這末宣佈其政見：

『……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於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故爲中國計，須立刻設立堅固政府。……余願進步黨人……與余通力合作……』

余之志願既如是宏大，必有誤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擊，……願余不因稍受波折，遂更變余最高應盡之職，蓋余之作爲，爲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計也。」

名義是很好聽的，什麼『保存中國』呀，『免中國之分裂』呀！但是怎樣能夠達到呢？就是要愛國者犧牲其愛國的政策。據他說，扶助了他，那末，中國也就可以『保存』了，中國也就可以『免於分裂』了，因爲他的『目的』——當然這只有天知道——就是『保存中國』，就是『保護中國免於分裂』。袁世凱在這裏也宣佈了他分化的政策：即利用起義內部革命派與立憲派的矛盾，爭取立憲派——袁世凱所謂進步黨人——去和他通力合作，以孤立並軟化革命派。

『我即中國』——這就是袁世凱最高的觀念。袁世凱表示不管四方對他如何攻擊，事業有何波折，他決不改變這個觀念，他決在行動上貫徹這個觀念。這是他所謂『最高應盡之職』。

袁世凱這種觀念，是反映了當時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觀念。滿清朝廷，這個統治機構，統治形式，是太朽腐了。這朝廷是代表大地主大買辦的集中統治，但是，在人民的衝擊下，這朝廷是再統治不下去了。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變更自己的統治形式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帝國主義者需要經過新的統治工具來奴役中國的人民，他們要一手打倒革命，又要一手推開滿清朝廷，重新建立大地主大買辦的新的集中統治，於是他們就在當時的

反革命人物中，根據袁世凱手裏的軍隊及其反革命的威望和手腕，找出了袁世凱，付給了他這末一種『最高應盡之職』。當時中國『上流社會』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莫屬』，在華外國人中所流傳的口頭禪是所謂『非袁不能收拾』，祕密就是這個。袁世凱就是這末得到他們的付托，宣佈了自己就是中國的代表——他即是中國，中國即是

他。

當時上海英文『大陸報』的北京電報正確地報導了袁世凱的計劃：『袁氏之意，實欲使北京政府（按：指當時滿清政府）、民國政府（指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並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獨攬大權。』

顯然的，袁世凱的活動，已引起了當時起義內部的紛亂。袁世凱武力的威脅，這是一；袁世凱狡猾的兩面派活動，這是二。在袁世凱武力威脅和兩面派活動下，起義內部的矛盾展開了。只要倒滿的目標達到，他們的上層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和袁世凱成立妥協，把革命宣告結束。那種掛『革命』旗幟的舊官僚舊軍閥，不用說願意奉袁世凱做自己的新主子。臨時附和起義的君主立憲派，希望經過袁世凱穩定自己的祿位。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人物很多也但願保留『共和』的形式，不願意再革命下去，他們只要袁世凱採取『共和』的形式，就同意他做起大總統。滿清朝廷不能再統治下去，起義內部不能再革命下去，袁世凱坐江山的局面就此決定。

北洋軍隊是袁世凱使革命和滿清朝廷都向他屈服的基本力量。當革命同盟會的領袖

孫中山在南京做臨時總統、組織起資產階級式的臨時民主政府（反滿革命派和君主立憲派的臨時聯合政府）的時候，袁世凱就使用了他的將校段祺瑞等人發出『誓死反對共和』的電報；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南方在談判中向他屈服，孫中山內定讓位，袁世凱又使用了段祺瑞等人發出『立採共和政體』的電報。革命把滿清朝廷的整個統治打得四分五裂，袁世凱手裏的武力無論如何已不能把滿清朝廷的統治重新恢復起來，但是，革命內部的上層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領導者，却極害怕袁世凱手裏武力的威脅。他們既然不能充分信任羣衆的力量，就不能夠團結起來，並不能深入動員羣衆，去抵抗袁世凱手裏武力的威脅。至於滿清朝廷那時已經只剩下了空架子，若干王孫公子雖然不願意袁世凱的篡奪，但是，畢竟毫無力量可以抵抗袁世凱手裏的武力。這樣，孫中山內定退位，溥儀也跟着決定退位。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溥儀宣告退位，命令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第二天（十三日）孫中山也便公開提出辭表，『推讓』袁世凱爲繼任總統。『民國政府』和滿清朝廷在同一時候都把權力交給了袁世凱，辛亥革命與愛新覺羅氏皇朝在同一時候宣告自己的結束。這叫做『全國統一』。

辛亥革命並沒有觸動過舊封建專制統治的、年代久遠的、歷在人民頭上的軍閥官僚政治機構，這種機構幾乎原封不動，僅換些名稱而已，這樣就便利於把權力從革命交給反革命。辛亥革命更沒有觸動過近代中國反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即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制度。雖然孫中山有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革命口號，但資產階級

並不希望、也沒有力量把它變成實際。這樣就更便利於反革命的統治在這個原來的經濟基礎上重建起來。

人民經過革命推翻了滿清朝廷，但革命的果實却沒有落在人民的手裏，而被大地主大買辦反動派代表人物袁世凱所篡竊而去。事業按照大地主大買辦和帝國主義的願望進行，軍閥官僚又都彈冠相慶了。

『民國政府』一些人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本來想叫袁世凱離開北洋軍閥官僚的老巢穴，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便約束袁世凱對民國的地位，但是既然是『民國政府』經過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之手納權給袁世凱（就是說，『民國政府』向袁世凱投降），而不是袁世凱納權給『民國政府』（就是說，不是袁世凱向『民國政府』投降），那末，袁世凱就職的問題，就只得按照袁世凱的意志，而不可能按照『民國政府』的意志。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本來是先受滿清朝廷委任『全權組織共和政府』的，如果你以為這樣說不妥，但還有『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縱使你南京參議院不推舉我，我還不是仍然可以在北京做我的大總統？按照袁世凱所說，他所以接受南京的推舉，不過是因為照顧南北的統一。並且，『北方軍民意見』是不要他離開的，北京外交團又是『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的，『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志』。你孫中山和南京參議院一定要他離開這末一個地方，豈不就是『危害民國，破壞統一』？但是『民國政府』還是遣使迎袁南下，

於是袁世凱的親信軍隊（就是後來以『賄選總統』著名的曹錕直接部隊）又顯現神威了。北京、天津、保定出現了受命的『兵變』，迎袁專使的寓所遇劫，所謂專使也者，僅以身免。這當然是證明了袁世凱需要坐鎮北京而不能南下的理由。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迎袁的專使蔡元培曾經這樣大談其『民國的法理』：

『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爲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之個人較，機關爲主體，個人爲客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制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違法理，有以個人凌躐機關之行動，則爲專制時代朕卽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宜，實爲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

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機關就個人』了。『個人凌躐機關』了。神聖也可以侵犯了。袁氏在北京就職，居然也還是被專使們認爲『尊重法理』，也沒有『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袁世凱早已看穿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空談無用。袁世凱左右了法理，而並不是法理左右了袁世凱。袁氏『朕卽國家』已不是『嫌疑』的問題，而是從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時候便已開始了。

當南北談判還沒有結果，『民國政府』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還沒有決定交出權力的時候，袁世凱給梁鼎芬的信說是：『惟有益堅盡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奮此愚

忠，戰彼羣魔，但求皇統之能保存……。」又時常對人說：『余深荷國恩（按：指滿恩），雖時勢至此，豈忍負孤兒（指溥儀）寡婦（指隆裕太后）乎？』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描繪的：『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一愛新覺羅之大忠臣。』但是，一等到『民國政府』向他屈服的時候，他就對臨時政府這末說了：『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這些當然又是：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粹然中華民國之大忠僕。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斷言是對的：『大奸大竊，其貌每大忠大信。』在袁世凱的字典中，大忠大信的註解，便是大奸大竊。當他在宣誓忠於滿清舊皇室的時候，正是在他進行轉移清祚到他自己手裏的時候。當他在宣誓忠於共和的時候，又正是在準備完全毀滅共和的時候。

中國出現新的皇朝，這就是袁世凱的皇朝。但這皇朝開始是採取了『民國』的形式。對於袁世凱，這是建立正式的、公開的袁氏皇朝的過渡形式。

二二

辛亥革命的時候，社會各階級在反滿的目標下來一個向左走，革命的發展也就來得很迅速；在反滿的目標告一段落之後，參加起義的各黨派即來一個向右走，革命的失敗

也就又來得很迅速。

資產階級的反滿革命派和袁世凱妥協之後，放棄了革命，變成了在野黨；原來一部份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則變成了政府黨。

原來的革命同盟會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已開始分化。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同盟會和一些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譚延闓等）及一些舊官僚（如唐紹儀等）結合起來，組成國民黨（民國元年八月成立），是為在野黨；而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張謇、湯化龍等）及一些舊官僚武人（如程德全、黎元洪等）則又和同盟會的另一部份人（如章炳麟、張伯烈等）結合起來，組成共和黨（民國元年五月成立），是為政府黨。這是北京臨時參議院中並立的兩大黨。不久，章炳麟從共和黨分裂出來，維持他原來成立的『統一黨』，而參加共和黨的一些君主立憲派（如湯化龍、林長民）和另一部份原來的君主立憲派（如孫洪伊）又以梁啟超為首領，另行成立所謂『民主黨』，打算操縱於參議院上述兩大黨之間。」

作為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分別，是在何處呢？國民黨的政綱是：『（一）促成政治統一；（二）發展地方自治；（三）實行種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維持國際和平。』共和黨的政綱則是：『（一）保持全國統一，採取國家主義；（二）以國家權力、扶持人民進步；（三）應世界之大勢，以和平實利救國。』國民黨的政綱除了『發展地方自治』是比較共和黨表現得民主主義和急進外，其他兩黨的政綱基本上已

看不出有什麼急進與漸進的分別。同盟會時代反映小資產階級要求的急進綱領（如孫中山所提出的『土地國有』、『平均地權』），本來是爲着吸引會黨——下層社會來參加反滿革命的，現在反滿的『革命功成』，反滿的『革命黨消』了，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表現了消沉，會黨的下層羣衆被拋出黨外，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早被忘記得乾淨，僅剩下一條毫無內容的、極端抽象的所謂『注重民生政策』。其他如『男女平權』的資產階級綱領也沒有了。『力謀國際平等』的綱領也改成『維持國際和平』了。軟弱的小等資產階級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地位也已走下坡。有些同盟會黨員曾經因爲同盟會與各種官僚政客的政治合併，完全拋棄同盟會的革命傳統，而痛哭過，但終歸沒有能力阻止宋教仁這種併黨的『政治手腕』（當時人們極稱讚宋教仁有政治手腕）。妥協是這時候國民黨的特色。他們的口號是『新舊合作』、『朝野合作』。它是袁世凱中央政權的在野黨，但却是力謀對袁妥協，而不是要推翻袁世凱的在野黨。黃興、宋教仁是國民黨這種妥協派特出的代表。黃興甚至勸請袁世凱參加國民黨，以便爲國民黨的領袖。

孫中山比較急進地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但又反映它們的弱點），在國民黨內也被視爲『不能實行』的『理想派』，這時候陷於失勢的地位，但是，即使孫中山本人當時也是決心『盡讓政權於袁氏』，『宣言十年不干預政治，俾國人專心信託之』。所謂『正式國會』的選舉結果，國民黨人佔大多數之後，孫中山仍然聲明：『余已力辭正式總統之候補，黃君（克強）亦必力辭，此事終不能不煩袁君。』國民黨

與共和黨對袁世凱政權問題上的區別，就是：國民黨擁袁而又企圖分袁的權力，共和黨則擁袁並贊成袁集中權力。國民黨還帶有代表一部份中等資產階級利益的色彩，但實際上，兩黨又都是代表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兩個不同集團的政黨：大部國民黨側重於代表新起的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爲『急進』；而共和黨則側重於代表舊存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此其所以仍然被稱爲『漸進』。但實際上，前者原來的所謂『革命』，已一變而爲取消主義，後者原來的所謂『開明』，已一變而爲守舊主義。兩黨人物傳統的政治鬥爭（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無疑地影響了這兩黨在袁世凱面前的紛爭，又影響了袁世凱對這兩黨的喜憎態度。人民已開始感覺，那是限於爭權的鬥爭，而很少原則的鬥爭。人民對於他們的鬥爭，已開始感覺得有些不耐煩，但袁世凱看到這兩黨的無原則吵鬧，則引爲大樂，因爲這兩黨吵鬧不但有他在內中鼓動挑撥，而且這種吵鬧正使他得用作證據，以證明他個人獨裁之好，而政黨則爲無用。

國民黨分袁權力的主張，就是關於所謂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的主張。這是袁世凱所認爲他們擁袁美中不足的主要東西。當時經過革命震動之後，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買辦需要袁世凱來代表他們，集中權力以穩定他們統治的秩序；而和大工業有關的大資產階級那一部份人也同樣地渴望經過他來形成一種穩定的秩序。袁世凱正以這種秩序的『救主』顧盼自雄，他怎麼會肯分出權力呢？而且你已向他交出了權力，是你給他的便宜，現在又想向他要出一部份（那怕是很小的很小的）權力，他却就不給你這樣便宜。

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反革命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對於權力都是極端吝嗇的。沒有一個反革命反人民的大獨裁者願意分出一些兒權力給人的。相反，權力的貪得無厭，正是歷史上一切反人民的大獨裁者的特色。你看！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還是母子的關係（雖然是過繼的），但是西太后是絕不願意把一點權力分給她的過繼兒子的，甚至臨死的時候，還認爲『我不能先你死』，而狠毒地把光緒帝先毒死了（有一種傳說，袁世凱怕西太后死後光緒帝對他報復，曾參與這個毒死的陰謀）。何況對於袁世凱說來，國民黨還是異己的勢力，袁世凱怎能因爲國民黨的擁護，而卽出讓一部份權力？所以，不論責任內閣也罷，地方自治也罷，袁世凱都是不會有所讓步的。

袁世凱雖然已取得了總統，但在他看來，一切對他的獨裁權力有所礙手礙足的，都必須完全『掃蕩』，他必須繼續他的『統一』事業。特別由於辛亥革命在各省所造成的局面，當時國民黨人因爲同盟會的關係，還佔有南方六七省的地盤（都督是國民黨人），這是他所必爭的。他不能因爲『民國政府』已獻出中央政權，而就可認爲滿足的。他也不可能因爲同盟會已改組爲在他政權下的妥協黨，而就可認爲滿足的。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派系的地盤，一切還沒有落在他的直接掌握中的，他也都是要一一收拾的。你交出權力！再交出權力！還再交出權力！這就是他對一切異己者的要求。當他一登總統之台，他便逐步地、而且不遺餘力地，集中他在這方面的注意力。

袁世凱的『統一』旗幟，一個是『軍令』，又一個是『政令』。就在任臨時總統後

二十天（民國元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就頒佈了『訓勉軍人令』，提出『服從統一命令』，這個軍令就是爲的要消滅辛亥革命後的各省起義部隊，以及其他一切異己的部隊，至少要把各省起義部隊以及一切異己的部隊改編成他御用的部隊。四月廿九日，他出席參議院的演說，開宗明義提出『古今立國之道，惟在整飭紀綱，修明法度』。這個政令就是爲的打散起義各省人民所自發取得的若干自由權利，以及其他一切在異己手裏的權力，以維持他所統治的秩序。固然，紀綱只是袁世凱的紀綱，法度也只是袁世凱的法度；但你以爲他要人家服從他的紀綱和他的法度，就要說他有私圖嗎？『此地無銀三十兩』。別人還有私圖可說，至於袁世凱，據他歷來莊嚴的聲明，那是一點私圖都沒有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本來在老家，就是『私冀抱甕灌園，長爲老農以沒世』的；滿清朝廷向他求救，要他出來鎮壓革命之後，他就是聲明『一俟大局稍安，國勢粗定，便當退避賢路，翩然挂冠，成都之桑，東陵之瓜，足娛此生，庶畢乃願』的；等到他用盡手段，取得大總統而甘心之後，他仍然說，這樣完全不是他的『私願』，他的私願本來是躬逢『共和政體』盛舉，就要『從此退休田里，共享昇平』的。但是，既然『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他就只好做下去。而且按照他的邏輯，『國民』既然『委託』他了，他就是『國民公意』的代表，反對他也就等於反對國民。在民國政體下面，反對國民是什麼意思呢？那當然就是反對民國、危害民國了，於是他就有保護民國的責任，可以以把這種『反對民國、危害民國』的人鎮壓下去。看他就職大總統後，不過三個月，他

的姿態就已經是一個十足的『民國的保護者』了。他說：

『……世凱膺茲艱鉅，自不得不力為支持，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託，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復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忤，亦復遑恤其他？……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藉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知我罪我，付之公論。』

你看！袁世凱原來是一點私心都『沒有』的，他是共和得很，『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的。有私心的是誰呢？那當然是不能對他『開懷相諒』，不能任他『予取予求』的人，乃至是不滿意他、反對他的人。由袁世凱看來，他們都是『天下為私』的。對這種『不顧大局』的人，他已經極其委曲求全了，但是，如果他們還不願意完全投降，繳出家私，他『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這是他們該死，絲毫不能怪到他的。責備他專制自為，責備他專斷獨裁，都不過是『悠悠之口』，『擾亂之階』。

同時，他對於當時由他在背後操縱的各政黨，又以『民國的保護者』的姿態，出來教訓他們息爭了：

『方念民國初興，尙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無論任何政黨，均宜蠲除成見，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若乃懷挾陰私，激成意氣，

習非勝是，飛短流長，藐法令若弁髦，以國家爲孤注，將使滅亡之禍，於共和時代而發生，揆諸經營締造之初心，其將何以自解？輿言及此，憂從中來，凡我國民，務念闔牆禦侮之忠言，懷同室操戈之大戒，折衷真理，互相提攜，忍此小嫌，同扶大局，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你看！袁世凱多『愛國』呵！他是最沒有政黨成見的，他是只知道國利民福的，他是主張團結的，他是主張容忍的，他是主張外禦其侮的，他是反對同室操戈的！

民元八月間，孫中山和黃興北上。九月間，袁世凱的總統府祕書廳發表一個通告，聲稱：『大總統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久欲聯合各政黨魁傑，捐人我之見，商榷救濟之方，適孫中山、黃克強兩先生先後蒞京，過從歡洽，從容討論，殆無虛日，因協定內政大綱八條……』末了又稱：『各國元首與各政黨首領，互相提攜，商定政見，本有先例，從此進行標準，如車有轍，如舟有舵，無旁撓，無中阻，以專趨於國利民福之一途，中華民國庶有豸乎！』說得又是多末『誠懇』，多末『仁至義盡』呵！

但這個『民國的保護者』正『勞心焦思，幾廢寢食』，一步一步地進行把中國變成爲袁世凱的私國。唐紹儀是一個平日在袁世凱下面做事、替袁世凱辦外交的人，他代表袁世凱南下議和，因而加入同盟會，旋被袁世凱提議爲袁政權第一任內閣總理，但却敢以『民國內閣總理』的名義和袁世凱爭副署責任，這個內閣不過三個月，很快地坍台了。那個辛亥革命遺留下來、但已僅作爲袁世凱專政粉飾的參議院，不肯通過陸徵祥內閣的

名單，馬上有什麼叫做『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出來發通電發傳單反對了，又有什麼叫做『軍警會議公所』開特別會議主張武力解散參議院了，結果當然又是軍警戰勝了參議院，內閣的名單通過了。又過了不久，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趙秉鈞，經過黃興的疏通，得到了參議院國民黨人的同意，公然被任爲內閣總理了。而且這個『趙內閣總理』和他的『國務員』還填寫了入國民黨志願書。參議院原來是國民黨人佔多數，他們既一心一意只想掛起一個『政党内閣』的招牌，來滿足其『政治慾』，趙秉鈞當了國務總理，他和他的閣員便被邀請入黨，趙內閣就變成所謂國民黨內閣，叫國民黨人一時大高其興。這樣，國民黨要求『政党内閣』——正如當時新聞界所恰當諷刺的——却變成了『內閣政黨』。這樣，參議院與趙內閣也就沒有可『爭』了，袁世凱也就更『統一』了。

不久，宋教仁以國民黨黨魁的資格，利用國民黨在『正式國會』的選舉中佔多數，一面主張選袁世凱爲正式總統，但一面主張以國會多數黨組織責任內閣，而他自己便是活動作爲這個政党内閣的候選人，真正企圖在袁世凱的軍警刺刀下，分嚐一杯羹。宋教仁這個活動，這個可憐的幻想，當然和袁世凱平日吞併異己的原則，即『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是不符合的。對於袁世凱，可以同意那種趙秉鈞式的、以袁氏自己心腹當內閣總理的資格參加參議院政黨，但決不能夠同意這種宋教仁所企圖的、以袁氏異己的國會多數黨的資格組織內閣。於是，正當召集國會的前夜，宋教仁於民國二年三月

二十日在上海車站被刺殺了。袁世凱得到消息的時候，表現了『愕然』的神氣，說：『有此事乎？即命拿電報來！』看了電報之後，他又『愕然』地說：『確矣！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遜初，少了一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他又即電令江蘇的都督和民政長：『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情嚴辦。』確情窮究的結果，主名不是別人，正是大總統袁世凱；經理就是袁世凱的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袁世凱的國務秘書洪述祖；直接組織行動的人那就是袁世凱在上海的巡查——『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應桂馨。後來應桂馨脫獄北上請功，但是正如嚴復所說：『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袁世凱爲滅口起見，就暗中叫人在車上把他刺殺。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向袁世凱鳴不平，謂『如此，以後誰肯爲總統做事？』沒有幾天功夫，趙秉鈞也突然七竅流血，嗚呼哀哉。應桂馨和趙秉鈞是都按照袁世凱的『法』嚴辦了。但並不是因爲他們是謀殺者而受到『嚴辦』，却是因爲他們可能洩露袁世凱的祕密而受到『嚴辦』。至於謀殺的主名袁世凱呢？按照袁世凱的『法』，當然他是不受嚴辦的，倒是他要嚴辦那一切追究他進行謀殺的人了。

一不做，二不休。接着謀殺案，袁世凱從五國銀行得到一筆所謂『善後』大借款，就決心發動了剷除異己的大內戰，這就是民國二年所謂『贛寧之役』的內戰。內戰的名義就是『統一』。在清末時，便爲袁世凱爭權的政敵——岑春煊託人進言調和。袁世凱說：

『今日並非調和南北問題，乃係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問題。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我與岑君等皆不能說話。……至李烈鈞等爲地方長官，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

你看！袁世凱多末『光明正大』呵！雖則法院傳不到宋案正犯，國會也沒有通過借款，但袁世凱說：『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議會。』他是絲毫沒有干預過的，而且還『不能說話』。他是『奉公守法』的呵！至於什麼『地方不服從中央，中央宜如何統一』呀，『於行政之系統上，中央不能不求統一之法』呀，這類『理由』也當然堂哉皇哉，我們現在聽來，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在得到外國強有力的撐腰之後，袁世凱發出了強硬的聲明：

『我現在已決心。*現在看透孫（文）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外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據黃遠庸通信，有此一句。）

你看！袁世凱就是這末威風凜凜了，就是這末殺氣騰騰了。這類話，我們現在聽來，同樣地又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當然，他依然是『民國忠實的公僕』。在內戰箭在弦上的時候，民國二年五月間，

他和一個外國記者這末談話：

『外國記者：近有人評論總統並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復君主舊制，有是事乎？』

袁世凱：予知此種謠傳，自不能免；然既爲公僕，豈能逃誹謗乎？……余既爲民國辦事，必當盡余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壞之危險，決非自余而生，必由於一般暴徒，以破壞國家爲主義者也。

外國記者：有人謂總統欲仿倣拿破崙，信乎？

袁（笑）：余欲爲華盛頓，非拿破崙也。華盛頓爲歷史中最有名人，建造自由國，余何故欲爲拿破崙而不爲華盛頓乎？

外國記者：現在中國最要之事爲何？

袁：對內對外均以和平，此爲最要之事。

『信不信由你』，而他的話是『誠懇』的。民國在他這裏，華盛頓在他這裏，和平也在他這裏。可是，口沫未乾，民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就向那當時以孫中山爲代表的殘存民主勢力——卽向那『以破壞國家爲主義』的『一般暴徒』——發出討伐令了。這個討伐令很長，文章唯在『統一』二字。據『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說，他讀了還受過感動而原諒過他（所謂『歷言爲政困難各點，想其實情，未嘗不感動，而可相諒於其要求增加權力之用心』）。這個討伐令的後面部份是這樣寫的：

『今欲濟此時艱，勤求治道，條理雖多，本原惟一：首在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此本苟廢，他復何麗？本大總統昔以仁柔姑息，延茲厲階；今當以勇猛精勤，贖彼前愆。叛黨欲破壞民國，惟本大總統責當保之，叛黨欲塗炭生靈，惟本大總統責當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質天。紀綱所繫，威信所關，雖懷痛悼，其安得已。當此千鈞一髮之會，或亦除舊布新之機。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則拯墜日於虞淵，完漏舟於駭浪，雖云甚艱，何遽無術？所賴國人共宏大願。本大總統老矣，六十老翁，復何所求？顧斷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國，顛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許謀覆國家之兇徒以自恣。冀與邦人諸友，含辛茹苦，冒險犯難，奠此國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庶遂初志。敢告有衆。』

袁世凱口中的『規復政令之紀綱，建行國家之威信』，翻譯爲比較新式的口號，就是：『軍令政令之統一』。按照袁世凱，除了全部權力都統一到他的手裏外，中國就沒有出路，一切就都沒有附麗。『統一』是袁世凱的『救國萬應丹』。當然，這並不是中國人民的統一，不是中國民族的統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袁世凱所追求的反人民、反民族的『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據袁世凱自己的告白：他以前的罪過在於『寬大』，所以『統一』不起來，現在要給大家看看他的手段了。『以袁氏生平之歷史，對於滿清，惟知辱權植勢，於屬吏，則專以貪黷不識字之流爲爪牙，至於民事，則除却

捕黨人、遏民氣、斂財肥己而外無所能。『可是按照袁世凱自己所說，他現在却是民國唯一的『保姆』，生靈唯一的『救主』，而創造民國有功的在野民主派孫中山等人，却是『破壞民國，塗炭生靈』的『叛黨』。對於這樣『謀覆國家的兇徒』有什麼辦法呢？這位慈悲心深的六十老翁，萬不得已，只好揮淚起兵了。按照袁世凱，這不是反動，而是『除舊布新』；這不是專制，而是『方將集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這不是他私心有『何所求』，而是他希望『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懿歟休哉！這樣的大總統，簡直是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袁世凱自比華盛頓，真太謙虛了。

除了袁世凱慈悲心深的動機外，袁世凱當然還有他討伐的法律根據。另一道討伐令就拿出法律根據來了：

『該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竊土地，擅行宣佈獨立，破壞民國之統一，擾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爲，實爲亂黨，政府不得不依照國家法律以兵備警戒，是用兵定亂，爲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

民國的『國家法律』，變成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袁世凱的『國家法律』，變成民國的『國家法律』。當時在野黨許多人也祭起『法律』的旗子，想要經過這種『法』制袁。但當時孫中山的估計是對的：『國會乃口舌之爭，法律無抵抗之力。』

袁世凱咄咄逼人，國民黨人一切的卑躬屈節都落空了。國民黨人本來想在袁世凱政權下組織責任內閣，現在却是袁世凱的內閣（此時由段祺瑞代理）要問國民黨人的責

任。孫中山主張爲『純粹在野黨』，不問袁世凱的政治，專辦實業，但袁世凱的政治却要問孫中山的『實業』了。孫中山依然是被叫作『亂黨孫文』，宋教仁業已因穩健飲彈而死，黃興也以穩健派而列名爲逆首，罪名都是『破壞民國之統一』。妥協者自食其報。國民黨人既放棄民衆，而和反革命作犧牲革命的妥協，既放棄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綱領，把他們的綱領降低到和袁氏的與黨綱領差不多一樣，結果就把自己從民衆方面孤立起來，並且不但沒有解開袁世凱對於他們的敵視，反而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對他們的卑視，與更加引起了袁世凱吞併異己的野心，同時也促進了袁世凱的與黨（此時共和黨已與統一黨、民主黨按照袁世凱的計劃合併起來，叫做進步黨）更堅決地站在袁世凱方面，而成爲袁世凱動員『輿論』的先驅。這種對反革命作投降的妥協又在在野黨內部引起了精神的瓦解，政治的混亂，形成了離心離德和各找出路的現象，即促進了其內部的分裂，並鼓勵一大批賣身求榮的人，這就便利於袁世凱的襲擊。妥協變成了投降，因而妥協就注定了失敗。等到他們受袁世凱的大迫害，臨時抱佛腳，在民衆面前自陳曲直、重新向民衆求救的時候，民衆因爲受過一度拋棄，沒有從他們手裏真正得到過共和的利益，對他們的行動表示了懷疑，表示了冷淡。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和一般大地主、大買辦、大金融家、乃至大企業家——如前面所說——却又正需要袁世凱的軍隊穩定他們的秩序。老奸巨滑的袁世凱看準了情勢，就對他們進行了突然的襲擊。他們就手足無措了。

當宋案暴露和袁世凱公開挑戰的時候，孫中山積極起來，主張對袁採取堅決的討伐行動，表示了民主主義者的氣概，但是却只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黃興遲疑不前，且臨陣而一走了事；而各省國民黨都督的發難，則已在袁世凱軍隊南下四佈，獲得絕對優勢之後。戰爭在七月間爆發。討袁軍據有六七省的地盤，擁有數十萬的軍隊，但因為他們和民衆是分裂的，他們內部是分裂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被袁世凱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袁世凱興高采烈，奏了自己的『凱歌』。

這是袁世凱的又一次『全國統一』。袁世凱的權力又增加了一步。且再看袁世凱在取得了這又一次『統一』之後，如何實行他的『勤求治道』吧！

四

在打散討袁軍之後，袁世凱就準備經過『正式國會』，把自己由臨時大總統升任爲正式大總統。

我們這裏先由國會說起。

所謂國會，這是中華民國的虛偽招牌，實際上，這和過去參議院一樣，不過是袁世凱專政的花瓶。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特產的國會。

原來所謂國會議員，除了若干個別的議員之外，並不是真正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這只是一批政治的金錢買賣。在初選時候，各地方的所謂『候選人』（其中大部份屬於官

僚、政客、黨棍和原來的紳士、土豪一類），他們任意假造選舉名冊，僱人投票『選舉』自己，並且各『候選人』之中又互相做一番買賣，誰的勢力越大，花錢越多，誰就越能當『選』。在初選中這末買賣之後，『當選』的，也就得了機會，可以在『複選』中做一番較大的買賣，看誰的勢力大，誰買票的錢多，他就賣票給誰，這樣，他就不但撈回了在初選中投下的本，並且還重新賺了錢；而誰花錢越多的，買的票數當然也越多，也就可以『正式當選』做起國會議員了。這批議員一到了北京，便可以做一番更大的買賣，賣給這黨，賣給那黨，而最大的買主，並且在各黨背後操縱者，便是袁世凱。『其時收買方法，除脫黨入黨外，有不必脫黨入黨，投一票贊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要投一票贊成一事，止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買賣議員從中說合者，未能如約得折扣之資，竟提出訴訟，以買賣豬犬鷄鴨亦無中資不付爲比者』（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此輩有以一身兼賣與四五黨者，賣完之後，一律脫黨，自名厭棄黨爭，其實將等到將來有大宗買賣時，做一回大買賣，免得受黨議拘束』（黃遠生遺著）。這樣的議員所組成的國會，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專政的花瓶，而由這樣的議員所形成的國會政黨，又當然只能成爲袁世凱玩弄的工具。在選舉時，由於國民黨還有六七省的地盤，利用了辛亥革命的影響，『吸收無數的投機政客』，全力在選舉上角逐，竟得了國會的絕對多數。如前面所述，宋教仁就是因爲國民黨的『選舉』勝利，而熱衷於計謀組織政黨內閣。袁世凱本來認爲他的武力足以戰勝一切，左右一切，對於這種選舉，沒有

加以特別注意，後來看到選舉的結果，『始悟疏忽選舉之失策，乃別圖補救』。宋教仁被刺，便是袁世凱這種『補救』政策的一着。刺宋是在民國二年三月二日，不過二十天，四月八日，國會便正式開幕。五月二十九日，即當袁世凱策劃的內戰空氣瀰漫全國的時候，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黨便在袁世凱計劃下『應連合組進步黨，大爲政府張目』。另一方面，國民黨議員在袁世凱的金錢和武力兩種東西的策動下，即開始陸續分裂爲各小政派。議員們只要有錢可賺，便可以身兼數黨，而看風轉舵，朝秦暮楚，便成爲他們的學問。國民黨既是國會的多數黨，於是國民黨議員便成爲袁世凱收買的主要對象。國會已完全在袁氏玩弄中。

在袁世凱反人民的武力和財力的統治包圍之下，縱使在野黨原來是在國會佔多數的，但是國會却畢竟只能做袁世凱獨裁的裝飾品。

在贛寧戰役中，進步黨的熊希齡便由袁世凱提出爲內閣總理。熊希齡在清末是屬於康梁的君主立憲派。原來有名的君主立憲派如梁啓超張謇都是此時進步黨的首腦，也都是熊內閣的閣員。國民黨議員與進步黨議員共同通過這進步黨即原來君主立憲黨的內閣。袁世凱的策略是先取得與黨，孤立和拆散在野黨，暫且繼續利用與黨以內閣的名義及其言論機關相助，以便於自己用武力把在野黨打碎到底，並使這個與黨在這種打碎在野黨的事業中負有名義上的共同責任，表示他的行動是大公無私；而後在利用這與黨的過程中，一方面提防與黨的驕縱，避免與黨的聲名過盛，另方面便準備在利用它到一定

程度的時候，倒轉過來，也把它收拾，拆散，搞掉。熊內閣的成立，便是袁世凱這種策略的運用。熊希齡、梁啟超在戊戌政變時候，是吃過袁世凱的虧的，現在却忘記了仇恨，願意成爲袁世凱手下的『第一流人才』（當時熊內閣稱爲『第一流人才』內閣），滿以爲狡兔死，走狗可以不烹，而且還以爲在袁世凱這個變相的『君主』之下，可以繼續借用國會搞立憲的老花樣。

袁世凱在內戰勝利後，留在北京國會內的國民黨議員居然和進步黨議員合作起來，彼此都還想在袁世凱這個『大總統式』的新君主權力下啃一下所謂『立憲』的骨頭，想拿『立憲』作爲自己的遮羞布。這些『君主立憲派』放心袁世凱，可是一切反革命的大獨裁者都是最多疑的，袁世凱究竟放心不了『君主立憲派』。地主資產階級（包括一定部份的大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派』與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最反動的部份）的獨裁派之間還是有矛盾的。另一方面，縱使袁世凱相信這些君主立憲派對他十分忠心，但是他們究竟沾染一些過去十大夫的學究氣味，做起事來還有斯斯文文的味道，不夠痛快，而袁世凱却是要大刀闊斧的。於是，袁世凱又在國會中收買一部份議員，製造一個更直接的御用黨，這就是民國二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所謂『公民』黨，以作袁世凱在國會的直接打手。

這個打手黨的『第一步政策則在選舉袁氏爲正式總統』。本來在當時國會中，有一種『先定憲法、後舉總統』的意見，即使進步黨的首領梁啟超開始也是這樣主張。可是

袁世凱却迫不及待，急於要做一個沒有憲法的正式總統。這個打手黨出來活動，而進步黨也還是忠心於袁氏，於是事情便倒過來，先舉總統，後定憲法了。打手黨成立後不過二十天，十月六日，『由兩院組織選舉會，袁遣軍人到會，強迫投票，議員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買囑號稱「公民團」者數萬人，整齊嚴肅如軍伍，包圍衆議院數十匝，迫即日選出所屬望之總統，否則選舉人不能出議院一步。選舉人不得不俯首聽命，忍餓終日，以行選舉，直至袁世凱當選之聲傳出，公民始高呼大總統萬歲，振旅而返。』

不是國會對袁世凱使用權力（不是國會授權給袁世凱），而是袁世凱對國會使用權力（而是袁世凱授權給國會）。議員們餓足了一天的肚，袁世凱玩足了一天的戲。利誘加威脅，國民黨議員、進步黨議員和公民黨議員都一樣投了袁世凱的票。袁世凱如願以償，而且在選舉後四天的辛亥革命紀念日——十月十日就職。

袁世凱得到了『選舉』的勝利，國會在人民面前宣告了破產。

袁世凱就職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書，開章明義，又是重複了過去在臨時參議院所訂的『法門』：『立國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飭紀綱。』他又這末敘述了他用兵的『苦衷』，對大總統職位的『謙讓』，必須就任的『國民一分子責任心』：

『……事權牽掣，無可進行，夙夜徬徨，難安寢饋。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乃本年七月間，少數暴民，破壞統一，傾覆國家，此東亞初生之民國，

惴惴焉將不保。余爲救國救民計，不得已而用兵。幸人心厭亂，將士用命，不及兩月，內亂救平，亟思解職歸田，長享共和幸福，而國民會議羣相推舉，各友邦又以余被選之日，爲承認之期，何敢高蹈鳴謙，以致搖動國基，負我父老子弟之期望？蓋余亦國民一分子，耿耿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鈍不敢知，勞逸毀譽不敢計，是以勉就茲職。」

你看！又何嘗是他自己要權力？當然還是老調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天天認爲他的權力仍不足，又天天認爲他是第一個不想要權力的人。

在宣言書中，他『以極誠懇親愛之意』，向『國民』講述他的『共和』大道理：即所謂『道德爲體，而法律爲用』。但一切按照他歸納起來，『仍不外道德二字』，『約言之，則忠信篤敬而已』。『忠之本義，忠於一國，非忠於一人也。人人以國爲本位，勿以一身一家爲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羣，……不以己之權利，妨害國家之大局……』。『不消說，袁世凱是第一個『不以一身一家爲本位』的。』孔子云：民無信不立。文明各國有以詐欺行爲誚人者，其受辱若撻之於市朝。……前清曾國藩云：立身以不妄語爲本。』不消說，袁世凱是第一個守信約，不妄語的。『奉公守法者則爲是爲善，越禮犯義者則爲非爲惡。』不消說，袁世凱又是第一個奉公守法，因而他所做的事又第一個都是對的，也都是善的。總而言之是什麼呢？就是只有他是第一個合格的國民，因而是第一個配當民國的大總統。所以，他結尾就這末說：『余故以最誠摯親愛之意申告於國民

曰：余一日在職，必一日負責。』『最誠摯親愛之意』，這句話在宣言書重複了兩遍，但後面所說，不消說乃是更其真實的，這是給人警告：他必堅持他的權力，他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有誰或什麼侵犯到他的權力毫髮，他就將無情把他繼續打碎下去。

袁世凱授權給國會，主要的只是『選舉』他做總統一件事。這一件事完畢之後，他就準備以大總統的名義行使自己的全權，不要再授什麼權給國會了。在袁世凱看來，國會如此便已完成了任務，功德圓滿。國會對於他已經不算是花瓶，而且只是一個無用的累贅的廢物。可是議員們不知趣地總想：國會還可以在袁世凱面前爭妍，而且還是爲老態龍鍾的袁世凱增長顏色。袁世凱並不感謝這個。大地主大買辦在經濟上剝削人的殘酷無情，反映其在政治上對待人的刻薄寡恩。並且因爲有外國帝國主義者在金錢上武裝上的輸血，這個大地主大買辦集中的政治代表者感覺到還年青貌美，精壯力強；而人民自覺性的不足，又加深了他的自信。他認爲這種花瓶有時候是有用的，但有時候反而使自己減色。在他就職總統後的幾天光景，他就出面向國會要公佈『憲法』的權力，說是『所有之法令，均須經大總統公佈，始能有效』。就是說，不經過他完全同意的憲法，不是經過他親自製定的憲法，就不能有什麼『憲法』。袁世凱也可以有他的『立憲』，但他限定只能是絕端專制主義的『立憲』，只能是把他的絕端專制主義寫爲成文的『憲法』，而不能有任何越過這個界限的『立憲』。十月六日，他又向衆議院提出增修約

法，以便放任大總統的權力，『總覽政務之統一』。他說：『本大總統一人一身之受束縛於約法，真不啻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縛於約法。』你看！他一人一身受約法束縛，就是四萬萬同胞身命財產受約法束縛！『朕即國家』的思想，公開躍在紙上了。同月二十二日，他派遣了八個欽差干涉憲法會議，說他『對於民國根本組織之憲法大典，設有所知而不言，或言之而不盡，殊非忠於民國之素志』。可是那個『憲法起草委員會』覺得這樣對『憲法』的面子太難看了：憲法可以變成大總統權力的註腳，但是也要別人來代作註，而不便由大總統自己來作註。結果八個欽差沒有列席。袁世凱就於同月二十五日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說：『那起草憲法的一些人，『始則託名政黨，爲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聞其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簡直是『國會專制』；『值此建設時代，內亂外患，險象環生，各行政官力負責任，急起直追，猶虞不及，若反消滅行政一部獨立之權，勢非亡國滅種不止』；『各該文武長官，同爲國民一分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於是袁氏的一批爪牙馬上亦以『國民一分子』的身份，都一致起來附和作牛鳴馬嘯了。

袁世凱決心停止國會的存在，第一步便是設法停止國會的開會活動。於是，十一月四日便藉故下令（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副署）追繳四百三十八人的議員證書徽章，說：他們『但知構亂，以便其私，早已置國家危亡國民痛苦於度外，亂國殘民，於斯爲極』。

這許多議員們雖然在討袁軍失敗之後還誠惶誠恐投票選舉袁世凱做總統，可是袁世凱畢竟還是認爲他們『顯以民國政府爲敵國』；『顯以民國國軍爲敵兵』；『顯欲破壞民國之統一而不恤』；『顯欲引起列強之干涉而後快』。下命令後的第二天，袁世凱派遣軍警拿着被追繳議員證書的名單，守住國會兩院的入口，一切到會的議員都要受嚴厲的檢查，國會開會就不足法定的人數。這是袁世凱迫使國會無法開會，作爲解散國會的第一步。

這樣，使得還沒有被追繳議員證書的議員（大部份是進步黨的議員）即政府黨議員，也大掃興了。他們向那以進步黨爲主的熊希齡內閣責問：『政府以去害羣、扶正氣爲前提，實與議員等素志符合，唯去之之方，是否適法，扶之之道，是否誠心，羣懷疑慮，勢難緘默……』『既以非法使國會永無開會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壞國會之名，究竟奚所取義？是何居心？』這個第一流人才內閣的總理給他們這樣答覆：『大總統於存亡危急之秋，爲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繩？』總之，袁世凱做的事情，沒有一樣不是『光明正大』的，而且沒有一件不是『救國救民』的。袁世凱在停止國會活動之前，便已召集了一個御用的機關，即所謂『中央政治會議』，這御用機關現在便代替了國會，『袁氏乃隨心所欲』。過些日子，袁世凱的各省『軍民長官』，根據袁世凱的意旨，復電陳所謂『救國大計』，請袁氏解散殘餘之議員。民國三年一月十日，由政治會議議覆，認各省長官所請『理由正當』，於是袁世凱即以命令宣佈停止兩院現有議員。選舉袁世凱做大總統的國會解散了。這是人

民啼笑皆非的國會。它的解散，是在它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日子起，便已決定的。離開選舉時，僅僅兩個月，離開召集時，也不過九個月。應該更恰當地說，它的召集便決定了它的解散。二月三日，又停辦各地方自治會，二月四日，又交政治會議議決解散省議會，題目仍然不過『統一』。熊希齡副署了這一切命令之後，也因功德圓滿，被袁世凱一脚踢出了內閣。一時興高采烈的進步黨，再無望承恩邀寵，漸漸地消聲匿跡起來了。

袁世凱由他的御用機關『中央政治會議』製造一個『約法會議組織條例』，召集所謂約法會議，修改約法，把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和專制皇帝的權力一樣，『又復訂定治安警察法，以箝制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中央集權，元首獨裁，完全告成，袁益隨心所欲，一呼百諾矣』。五月一日，袁世凱公佈了修改約法的宗旨：

『查中國有歷史數千年，治亂興亡之迹，代各不同，然無論何種時期，其國之能治與不能治，率視政權之能一與不能一以爲衡。是以春秋著大一統之文，孟子垂定於一之訓……統治權惟一不可分，……方今共和成立，國體變更，而細察政權之轉移，實出於因，而不出於創，故雖易帝國爲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於政府者獨重，而盡望於議會者尚輕，使爲國之元首而無權，卽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羣情因之渙散，恐爲大亂所由生。』

『優待條件，爲統治權轉移所關，亦民國國家之所由成立……』
『改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實利，而不在徒飾美觀，首在爲多數人謀』

幸福，而不在與少數人言感情。救國但出於至誠，毀譽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隆大總統之權，而實以重大總統之責……。」

宗旨是什麼呢？說來說去，又是：第一是『統一』，第二是『統一』，第三還是『統一』。什麼是『統一』呢？按照袁世凱：『統一』就是總統的權力要等於大皇帝。袁世凱這裏公佈他的總統『統治權』是從滿清朝廷轉移來的，是滿清朝廷委任的，因此，他的權力必須因襲滿清皇帝的權力。按照袁世凱：當他有了這種權力的時候，國就會治，就不會亂，而且大多數人還會因此有『幸福』。現在袁世凱是真正有了這種權力，並且把這種權力規定在他的『約法』上了。

袁世凱有要求不盡的『統一』，因為這個中世紀的奴隸主和大洋行買辦的最高代表人對於權力的要求是不盡的。當他得了一個『統一』，馬上便接着再來要求一個『統一』。民國二年的內戰，是因為『統一』，後來解散國會，是因為『統一』，現在修改約法，又是因為『統一』。這就是他的『勤求治道』。這樣，『統一』又『統一』，便一步一步把袁世凱推上權力的尖端，同時也一步一步地把袁世凱送上墳墓的邊緣。

五

在前面所述的時期，袁世凱是在民國總統的新形式下，發展專制皇帝的內容。把這

個內容規定在御製的約法之後，他便逐步地要去掉這個新形式。這個在舊皇朝中撫育壯大起來的老軍閥官僚，非常羨慕皇帝形式的尊嚴，而大地主世襲財產的要求，正希望由皇帝的世襲秩序重新表現、並重新鞏固起來。爲着要加封黃袍在自己身上，這個大獨裁者首先安置他的部下以皇帝時代同意味的官號。內閣總理制的國務院不存在了，在袁世凱總統府下面設下了『政事堂』，有一個和宰相彷彿的職位與名義，叫做『國務卿』，這個新宰相，就是前清同袁世凱同僚、而又是前清的舊宰相徐世昌，當時人們已毫不掩飾地叫他做『徐相國』。在左邊，還有一個叫做『左丞』，在右邊，還有一個叫做『右丞』。儼然是皇帝的排行了。隨後，他又把各省都督改名爲將軍，民政長改名爲巡按使。這些都是告訴了他的部下：『你們都已有皇帝時代的官號了，難道可以沒有皇帝嗎？』

『中央政治會議』與『約法會議』既完成了袁世凱個人集權所需要製定的條例，因此就結束了它的自身。政治會議的所有『議員』皆以次得勳章有差。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袁世凱公佈了參政院組織法，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參政都是袁世凱委任的，共七十個人，按照一個在袁世凱背後當太上皇之一的英國公使朱爾典的話，是所謂『中國昔時之老成物望者皆聯翩而出』，前清大老和袁朝寵貴都在其列。進步黨的人物本來是『婢學夫人』的，此時却由夫人降作婢，也在參政院中坐了幾把交椅，熊希齡梁啟超在內。副總統黎元洪當了院長，前國會祕書長進步黨林長民當了祕書長。六月二十日這個參政院成立，據一個新聞記者所述：『參政諸公紛紛入場，老者不見蹣跚之容，少者

亦無倉皇之狀，盛哉其彬彬有威儀矣。」但是參政「諸公」固然有「威」有「儀」，「盛」則未必。那裏是一派古香古色，又是一片零零落落。開幕時，連宗旨都沒有說明，也沒有一人登台演說。因為：這實際上是籌備袁世凱帝制的專設機關，宗旨是不好公開說明的；「參政」們也都個個心裏明白，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話可說。

「約法會議」在「約法」上規定了總統等於皇帝的權力，而參政院的工作，首先就是把袁世凱這個皇帝式的權力規定為無限期的權力。原先，在所謂修改「約法」的時候，有一個袁世凱的下僚——四川城口縣知事姓陸的——揣摩了袁世凱的意思，呈請將大總統任期改為終身而止，就「內亂可滅，外患可靖」。袁世凱假惺惺，「初閱之，極為震怒，因陸弁髦約法之故。繼細思所陳理由，極可實行，故乃決意付各省都督民政長，徵求意見」。現在這個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就把袁世凱這個認為「極可實行」的「理由」，在「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上製成實際的條例。其要點有三：第一，總統任期十年，連任亦無限制；第二，凡屆總統改選之年，參政院參政得決議現任總統連任，無須改選；第三，總統繼任人應由現任總統推荐次期大總統候補者三人，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現任總統當然得以繼續當選，現任總統的兒子同樣。袁世凱的終身總統制，就是這樣規定的。這是「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為袁世凱籌設帝制的第一步「立法」。

袁世凱終要實行帝制，這早已是人們所窺見的祕密。民國二年三月間，有一個湖北

人姓裘的，『呈請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但是，那時，袁世凱知道在野黨還沒有倒，情況還有所待，而且覺得這個姓裘的這末一說，無異洩露『天機』，可能給在野黨以口實。於是這個姓裘的，不但沒有因此邀寵，而且因此大倒其霉。袁世凱那時命令說：

『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就職宣誓，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永不使帝制再見於中國……凡所設施，要以國家爲前提，合共和之原則，當爲全國人民所共信。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爲（指那姓裘的上書），若非喪心病狂，意存嘗試，卽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務爲寬大，置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觀聽，極其流毒，足以破壞共和，謀叛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輿言及此，憂憤填膺……着湖北民政長嚴行查拿，按律懲治，以爲猖狂恣肆甘冒不韙者戒！』

可是，自從內戰勝利、國會解散之後，袁世凱自己所說的『喪心病狂，意存嘗試』，『破壞共和，謀叛民國』，却由他自己逐步地大暴露出來。他一心一意要很快地『使帝制再見於中國』。當時事實上有兩種帝制派，其一是建立袁朝的帝制派，其二是清朝復辟的帝制派。後者這部份人屬於滿清的少數遺老遺少，他們看見袁世凱在『祭天祀孔，大事復古』，知道袁世凱快要稱帝了，但是，他們覺得袁氏和他們本來同是滿清

朝廷的臣子，如果要恢復帝制，便不應該由袁世凱自己來做，而應該恢復他們本來的『君主』。袁世凱對於他們這樣公開倡議宣統復辟的議論是不可容忍的。皇位雖然本來是清朝的，但是既然把握在他的手裏，怎麼能夠再拿回去呢？於是，袁世凱就大發其雷霆了。先由袁氏的傭僕所謂『肅政使』夏壽康來一個呈文，說是『大總統受全國人民付託之重，值此安危呼吸，斷不宜避嫌疑，致釀亂機』，而後由袁世凱『批令交內務部查辦』。他自己又下了命令：『須知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當然，袁黨並不受這種『常刑』的限制。這種『常刑』的所以限制那主張滿清復辟者，僅是爲着便於放手製造袁氏的帝位之目的。

俗語說得好：紙是包不得火的。袁世凱的準備帝制既路人皆知，而要達此目的，袁氏正準備和全國作戰。袁氏了解這件事必須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才可以有爲。日本帝國主義也正利用了袁氏的弱點，以實行其蠶食鯨吞的計劃，而西方帝國主義大戰又正是幫助了它的機會。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要袁承認。當時日本公使日置益手遞條文的時候，他很客氣地、而又半吞半吐地說：『請大總統高陞。』袁氏笑納其呈，低首而退。日置益又對當交涉之衝的曹汝霖說：『敝國向以萬世一系爲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爲復辟，則敝國必贊成。』當然，中國人民是不可欺侮的，近代中國人民爲祖國的解放而鬥爭已流灑過無數的熱血。條件被洩露之後，『當下各國新聞紙上都盡情登載，加以論斷，中國報紙才得轉譯出來。二十一

條的內容，頃刻哄動全國，一般熱心志士，愛國人民，都以爲亡國慘痛，已露朕兆，莫不奔走呼號，奮臂而起，到處開會演說，冀圖挽救，有的刺血上書，有的斷指自誓……風起雲湧，總算全國一致。」（『中華民國史演義』）袁世凱對於人民的愛國運動，採取了絕對的高壓手段。就使這種愛國運動是限於抵制日貨提倡土貨，也不許其活動。做這種運動的人物，都被官廳解散逮捕。比如，當時日本人的機關報都公開了諸如此類的電訊：『以鼓吹排日熱多數之印刷物自滬來漢之若干中國人，本日立被中國官憲逮捕，英界劇場方演奏排日戲劇，以中國官憲之要求停止之。』差不多日本人的報紙每日都登載了各地的袁世凱官廳這種鎮壓人民愛國運動的消息。同時，日寇的海軍則開進中國來巡邏，陸軍也進入許多地方『維持秩序』。袁世凱抄襲過李鴻章以夷制夷的政策，結果是：『各國公使皆向外交部勸告，中國須和平解決，切不可發生戰事。』五月七日，日寇送了最後通牒，並限四十八小時答覆，須完全應允，否則自由行動。袁氏爲了『高陞』，完成了日寇的願望。偉大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就此開了新紀錄。

五月十日，袁世凱下了『密諭』。他說：

『前清未造，政失其綱，泄沓成風，無人遠慮，加以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衛國？……』

『經此次交涉之後，凡百職司，痛定思痛，應如何劇鉅心神，力圖振作，倘仍復悠悠，事過輒忘，恐大禍轉瞬即至……』

『……持危扶顛，端資羣策。我國官吏，積習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濟私，庸謹者亦多玩物喪志，敵國外患，漠不動心，文恬武嬉，幾成風氣……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苟利於國，生死以之。』

又，七月二十二日，『國務卿面奉大總統諭』：

『試思甲午庚子兩役，何嘗不言臥薪嘗胆！而作偽日拙，以迄於亡……來日大難，寸陰是競……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

但是，『作偽日拙』的，恰又是袁世凱自己。日本侵略者取得了這末一個『外交大勝利』之後，就對於中國的統治者來一個嘲弄，那時東京居然有人到中國使館前大呼『支那外交大勝利萬歲』者。於是袁氏黨徒也就做了東京嘲弄的應聲蟲，自己起來嘲弄自己，說這是『中國外交大勝利』，或『元首外交成功』。

這裏且回憶一段內幕：日本人原來的二十一條要求一共分有五號，其中第五號是要求由日本掌握整個中國的政治、財政、軍警的大權，等於完全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這號要求，是預定不要袁世凱答應的，而是為的拿這號要求來便利於袁氏答應前四號要求。當袁氏已決定答應這第五號要求，並叫曹汝霖到日使館去表示『讓步』的時候，忽然得到了日本已決定撤回這號要求的消息，於是才改了語氣，而在最後覆文中變成了『日後協商』。袁世凱答應的東西，超過了日寇原來真正希望的東西，而從一月

到五月七日關於第五號要求的往來周旋，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虛偽的作態。可是，袁世凱和他的黨徒因此就有了『勝利』的題目了，而且袁世凱的黨徒，還希望提燈遊行、開會慶賀呢。日本侵略者拿二十一條作爲援助袁世凱稱帝的禮物，而袁世凱則拿二十一條的『外交勝利』作爲增加稱帝的掩飾。你看！直到十年之後，還有一個王芸生在『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替袁世凱辯護，說他在這幕交涉中『政策頗爲正確』和『捷才機智』，爲什麼袁世凱當時不會喊『我皇萬歲』呢？

當袁氏告訴人們要『痛定思痛，力除積疾，奮發進行』的時候，正是袁氏奮發進行帝制的時候，又正是袁氏忙於『關謠』的時候。民國四年七月，報載袁世凱對馮國璋『表明至爲痛切』：『以余今日之地位，其爲國家辦事之權能，即改爲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自古君主之世傳不數世，子孫往往受不測之禍，余何苦以此等危險之事，加之吾子孫也！……余已在英購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則余惟有逕赴他邦。』到八月間，袁世凱有一個美國『顧問』，叫做什麼古德諾的，寫了一篇文章，認爲中國適合於君主制，而不適合於共和制。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那些袁世凱的走狗都一齊大吠起來。沒有幾天工夫，楊度等一批人的籌安會也出現了。所謂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嚴復在清末本是君主立憲派，孫毓筠、胡瑛、李燮和本是同盟會和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劉師復本是同盟會員而早向滿廷告密的老叛徒。籌安會的宣言是這末寫的：『美人之大政治家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爲優，而中國則尤不能

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爲深切著明……。」這當然是袁世凱的心聲。這種中華民族敗類把一個外國政治流氓叫做『大政治家』，而又把他幾句話，捧之如神聖，以作爲他們叛賣民國的『合法』經典。袁氏既找到了外國人領港，於是他夢想的帝制運動就急轉直下。

一些天真爛漫的人們要求袁世凱嚴拿楊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國是』。但是，這個時候，袁世凱用得着『自由』。『自由』在袁世凱那裏找到了存在。他說：

『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體之組織，不應別有主張。且帝王總統，均非所願意……無論研究者作何主張，於余個人固無嫌疑可慮。余及國人均有身家產業子孫親族，人情切己，自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國民付託，何敢以非敢戀二者之嫌疑，而強加干涉？』

袁氏又說：

『此日如不任令學者輿論自由研究此項問題，則有一部份主張頗力，恐以武力搖撼國體，不如以此緩和其空氣。』

人家說他要稱帝，他却說連總統都『非所願意』。人家說他要依靠武力稱帝，他却說『自由研究』所以避免『武力搖撼國體』。而且他還是沒有一點私心私利，只是爲的讓人們自由研究身家產業子孫親族『永保安全之法』。但你懂得什麼是袁世凱所謂『自

由『呢？袁世凱的自由，就是在『民國』內，有鼓吹專制和帝制的自由，有反對民國和民主的自由，但不能有鼓吹民主與自由的自由，不能有擁護民國的自由。於是，『自由研究』的籌安會門口，有了袁世凱武裝的軍警站崗。這就是所以保護袁世凱特許的自由之神聖不可侵犯，又所以表示袁世凱所不允許的自由之必須鎮壓。

袁世凱既使用了『自由』，便又使用了民意。有一本演義說這是梁士詒對太子袁克定的獻策。梁士詒說：

『依我愚見，爭王定霸，固然須以武力為主，最爲名正言順。現在是取之於民國之手，自然以民意爲第一。而且民意兩字本是隨各人之用法，顛之倒之，無不如志。此外，在能得外交財政上之助力，便無不成的事。』

這雖是小說家言，但却反映了袁世凱一類人對於民意的看法，而且袁世凱的帝制運動的確是按照這種『顛之倒之』的方法泡製的。

爲什麼袁世凱需要使用『民意』呢？正因爲民意是敵視了袁世凱。雖然在袁氏的高壓下，但是，帝制運動很快在人民中間引起了普遍反對的浪潮。這種反對的浪潮，一直影響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在他們中間也引出了堅決的反對派。有一個叫做汪鳳瀛的，寫過一篇『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他認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而『新約法創大總統開明專制之特例，最爲適當』。關於世襲問題，他說：『新約法已定總統任期爲十年，且得連任，今大總統之得爲終身總

統，已無疑義，而繼任之總統，又……由今大總統荐賢自代……國會選舉，只限止三人，則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絕。」這個擁護『開明專制』的老頭子覺得專制與世襲的問題都已解決了，他覺得在中國的新情況下，這種新式的專制與新式的世襲，比起舊式的專制與舊式的世襲，更容易於鞏固統治，如果把這新形式的君主——『大總統』改變為舊形式的君主——大皇帝，則必『召亂速禍』。爲了不至於引起這種結果，這個老頭子是要力爭的，他說：『余作此文，即預備至軍政執法處矣。』還有一個梁啓超，這是大家所知道的，自從帝制議起，他就和袁世凱實行了公開決裂。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是這個時候的一篇名文。實際上，他和袁氏黨徒的根本分歧，是在於『還沒有到時候』這一點上。他的文章說得很明白：

『……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制，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俱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胆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翦滅之餘，乃定於一。』

梁啓超不希望走第二條路，而認爲：

『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爲之人，居可有爲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豈不在是耶？』

可是這第一條路現在是否可通呢？梁啓超說：

『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也？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隣脅迫，吞聲定盟，水旱癘蝗，災區徧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其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疇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萬一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

梁啓超肯定袁世凱稱帝的時機還沒有到，如果一定馬上要幹，袁世凱就一定要跌下去，而永遠爬不起來。他直接向袁世凱苦諫過：

『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灰老百姓歸向之心），長萑苻之志（長反抗者竊發之志）？……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

梁啓超的言論反映了一部份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也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危機的發展。他企圖使袁世凱取消帝制運動，而避免人民革命危機的爆發。他對於袁世凱的統治，表示了椎心泣血的忠誠，但是袁世凱却聽之藐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把自己的權力推到了極巔，要他那樣像梁啓超所說的『內治修明、百廢俱興』或『專精一慮、爲國家謀大興革』，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他只能製造無窮的內亂和外患，並『專精一慮』來對人民進行不斷的戰爭。

袁世凱的決定是不可挽回的。合起來有數百萬大數目的寄生蟲——軍隊、警察、憲

兵、官僚和土豪，他們原來是爲大地主大買辦的利益服務的，而由他們所結成的機構，又是舊皇朝傳下來的東西，保有極深固的舊皇朝的傳統，袁世凱既依靠了他們做總統，現在又決心依靠他們嘗試一番龍座的滋味，同時相信經過他們的『顛之倒之』，一定可以顛倒出一種叫做什麼『民意』的東西來，以擁護他登上龍座。

先是，由籌安會通電各省將軍、巡閱使、巡按使、都統、護軍使、各地商會，請他們派代表到京，以便表決贊成『君憲』或『共和』。當然，這所謂『君憲』，並不是原來君主立憲派所活動的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而是袁世凱這個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形式的君主，現在要採用公開的舊君主形式來統治全中國，而『立憲』乃是一種招牌。他說：『你們承認我這個君主吧！我給你們立憲。』如果有的話，這是什麼立憲呢？不是別的，這就是袁世凱式的極端專制主義的『君主立憲』。各省的文武長官，當然明白了袁世凱的意旨，都對於籌安會表示贊成，並紛派『代表』到了北京。籌安會本來打算經過他這一道手續，便由袁世凱即做起皇帝來。後來又打算，還是經過一道參政院的手續更妙，因爲那參政院是叫做『代行立法院』，它既爲袁世凱無限期的皇帝式權力立法，便可以更爲袁世凱正式的皇帝大寶立法。於是，那些各省的『代表』便變成爲各種『公民請願團』，由籌安會代草請願書，向九月一日開會的參政院請願了。

正當參政院開會討論、將付審查的時候，袁世凱特派『左丞』楊士琦到院發表宣言，照例（是千百次重複地）說了：他『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

卽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諉卸。他又說了：『維持共和國體，尤爲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可是，在這下面，『然』字在文章上出頭了：『然大總統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似應仍聽之國民。』這就是說：他的大總統是由『國民公舉』的，假如『國民』現在不要他做大總統，而要他做大皇帝，當然他也只得服從了。他說：『國民請願，要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你看！『請願』要他做皇帝，是爲的『鞏固國基，振興國勢』，當然，皇帝是應該做的。不然的話，豈不就是『破壞國基，削弱國勢』嗎？而反對帝制的罪名豈不就是在於此嗎？他說：假如這種請願是『徵得多數國民之同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什麼是『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呢？就是說，他自必『接受』帝位了。

袁氏文章的意思是這樣：如果完全由參政院的形式直接解決帝制的問題，是還不夠完備的。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他所以特示鄭重者，無非故作艱難，直逼出『民意』二字。』

在參政院開會中，由梁士詒組織『請願聯合會』，以便『同心激進，計日成功』。同時，各種請願團到處『聞風興起』，而各種『請願團』當中，『乞丐請願團』和『妓女請願團』（妓女花元春所發起），則完全象徵了這個帝制運動的真實政治，卽是乞丐式政治與娼妓式政治，而那批請願的人，不過是袁世凱收買下的一批政治乞丐和政治娼

妓。

『請願聯合會』的聲勢代替了籌安會。梁士詒後來居上，比起楊度來，成爲一個更急進的帝制急進派。在梁楊之間，因此惹起了一陣醋海風波（楊度以梁奪他的功，甚憤），可是帝制則更提前了一步。『請願聯合會』根據袁世凱的意思，向參政院請願，請以國民會議爲解決國體機關，參政院將請願書八十三件送給袁世凱，並建議根本之法，或提前召集國民會議，或另籌徵求民意妥善辦法。於是袁世凱就藉此發了命令，定於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國民會議』之複選，召集『國會』，解決國體。但是，這還需要兩個來月的時間。袁世凱和他的黨徒覺得夜長夢多，是不耐於守這兩個來月的時間的（雖然僅僅是兩個來月的時間）。這正如『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的作者所說：『將擒先縱，欲速故緩，又一種做作而已。』於是『請願聯合會』又以所謂『立法貴簡，需時貴短』再請願了。參政院以爲：『君主立憲爲救國良圖，必宜從速解決，而國民會議開會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國體未先決定，憲法何自發生？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真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因此，它建議即用『國民會議』的初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袁世凱的民意傀儡劇，就這末製定了。以後，就根據這個製定的劇本，逐步演唱出來。

袁氏黨徒們一些祕密的電報，後來被公佈出來。這些祕密的電報表現出袁氏黨徒演唱民意傀儡劇的經過，同時反映出清末和民國以來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統治民衆一種共同

的祕幕。這裏有大地主大買辦階級歷來的所謂什麼『選舉』、什麼『立憲』、什麼『國民會議』、什麼『國民代表大會』之實際的精華，而且可以說，如果不體驗這些精華，就不會通曉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至少是其政治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會表現自己的幼稚。

這些電報是些什麼呢？請讀者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下去吧！

『一、段芝貴等十人八月十三日發出電云：「現擬第一次辦法，用各省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請願改革書，每省各具一請願書均由此間代辦，隨將稿底電聞，請將尊名並貴省紳商列入。」

二、九月二十六日孫毓筠發出電云：「現擬另籌徵求民意辦法，由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就在省各縣紳民中，每縣擇定一人，召集臨時公民大會。」

三、九月二十七日籌安會代表團發出電云：「各縣投票人，事實上雖係軍民長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須用各縣推舉字樣，以昭鄭重。一面指定各縣投票人，一面即將各縣投票人姓名，分飭各縣知事，補具詳文正式推舉，但須倒填日月耳。」

四、九月二十九日朱啓鈴等所發電云：「現正擬另組公民大會，即在各省地點開會表決，以期速定大計，惟組織方法，雖由參政院議定，而組織之精神，則在各監督長官有以操縱之而利用之，此項公民每縣擬公推一人，能於在

省各機關中挑選此項人員，必不至於誤會意旨。」

五、十月七日朱啓鈴等十人發出電云：「國民代表大會推戴電中，須有『謹以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字樣；委託參政院爲國民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至商軍政各界推戴電簽名者，愈多愈妙，將來宣詔登極時，國民代表大會及商軍政各界慶賀書，亦請預擬備用。」

六、十月十日國民會議事務局發出電云：「國民會議議員各縣之初選當選人，實爲產出國民代表之樞樞，允宜特別注意，各縣初選監督，當能體會入微，善爲運用。儘可於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擇其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圍者，預擬爲初選當選人。再將選舉人設法指揮，妥爲支配。果有滯礙難通處，不妨隱加以無形之強制。」

七、十月十一日朱啓鈴等十人發出電云：「每縣初選當選人來省報到，必須設招待員，或派員疏通意見，再由監督官以談話宴飲爲名，召之至署，將君憲要旨，及中國大勢，並將擬定充選之人名示之，須用種種方法，總以必達目的爲止。」

八、十月十五日國民事務局發出電云：「國體改革，果能於形式上辦到絲毫無憾，自足爲久安長治之基；凡關於法律上之形式，除確有障礙者外，務必

表示鄭重。」

九、十月二十六日朱啓鈴等十人發出電云：「團體投票開票後，當即行推戴，無須再用投票手續，即由公等演說應推戴袁世凱爲大皇帝；如贊成，應起立；表決後即將擬定之國民推戴書，交請各代表署名。事畢，再由公等演說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即將預擬之國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電稿，交請各代表贊成。至推戴書文內必須鈗入字樣，已將漾電奉達，此四十五字，萬勿更改。」

十、十月二十九日國民會議事務局發出電云：「前次電達以後尊處用款，有無窒礙情形，統希隨時密示本局，謹當竭誠相助，以便尊處放手辦事。」

十一、十月十一日國民會議事務局發出電云：「京外官署往來密商之件，實爲治亂安危所繫，設或稍有洩漏，轉蹈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件若傳於道路，尤恐貽政治歷史之污點。此節對內對外，動關國家威信，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

十二、十二月二十一日國民會議事務局又發出電云：「此項電文無論如何慎密，終涉跡象，倘爲外人偵悉，不免妄肆品評，更或史乘流傳，遺留開國缺點，中央再四思維，以爲不如一律查明燒燬，萬望趕速慎密辦理。」

讀者不難了解了吧？中國大地主大買辦的歷來政治代表們，一會兒可以藉口人民幼

稚無知，這樣的會不准許開，那樣的會也不准許開，如果你要求什麼『民選』，要求什麼『國民大會』，要求什麼『憲法』……等等，那他準定給你一看他的顏色，監禁，殺頭，不一而足。可是，等到他一會兒覺得有需要了，於是這些東西的出現，其速度就簡直叫你難以相信，你本來說什麼，他就馬上可以拿出什麼來，『民選』也有，『國民大會』也有，『憲法』也有……，讓你來個應接不暇。當然，一切都裝得正大光明，像煞有介事。要領會這一類的祕密，就必須精讀袁氏黨徒這些電報。

民國四年十月八日，袁世凱公佈了『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十多天後，即十月二十五日便開始選舉，又三天後，即十月二十八日以後便繼續『國體』投票。到了十二月十一日，所謂『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開會，『彙查全國國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張君主立憲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張』。當天『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宣稱：『全國民意，業經決定君主立憲國體』，並以受委托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的名義，上書勸進。當天（又是一個當天），袁世凱答覆得『很妙』：『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你看！袁世凱就是第一個尊重民意的。可是，他說：『追懷故君……今若驟躋大位，……於道德不能無慚。』又說：『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爲……於信義無可自解。』因此，他希望國民代表大會另行推戴，並退還了推戴書。你看！他既那末尊重了民意，又那末照顧到了道德和信義，而又那末謙讓之至，越發活該

做大皇帝了。於是，當天（還又是一個當天）代行立法院又再集會，在十五分鐘間成二千餘字的第二次推戴書，卽晚進呈，裏面稱頌袁世凱有六『功烈』，說是：『凡此六者，皆國家命脈之所存，萬生安危之所繫……我皇帝之功烈，所以邁越百王也。』接着又稱頌袁世凱的『盛德』，說是：『盛德滂流，蕩蕩巍巍』，『千古鼎革之際，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爲亘絕古初也。』

十二月十一日一天之間，已完成了四個手續：第一，查票；第二，上推戴書；第三，謙讓；第四，再上推戴書。真是緊張得很。到了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就正式承認了帝位，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到了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並冊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

袁世凱宣佈自己是民意所推戴的時候，他當然深知那所謂『民意』不過是代表了自己專制權威的意志，而並沒有代表任何一個人民的意志。幾百萬的軍隊、警察、憲兵、官僚、土豪和所有的軍閥官僚機構，是袁世凱權威的政治象徵，也是袁世凱權威的政治基礎。他們是向四萬萬幾千萬人民吸血而取得生活，他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可調和，但和袁世凱專制的利益却是可調和的。袁世凱經過了他們的手，盡量地利用他們的機構，而取得了『恭戴今大總統爲中華民國帝國皇帝』的『民意』，正如一些外報所評論的，那不過是『以少數人之私心，詐稱合全國之同意』，而人民『固不願以袁世凱

爲帝，始終未嘗請袁世凱爲帝』。實際上這等於在激動民意起來反對他這個『中華民國皇帝』。一個著名的故事：孫權勸曹操稱帝，曹操說，是兒要把吾放在爐火之上。可是現在袁世凱正是把自己放在爐火之上。但是，當他在把自己置在『爐火之上』的時候，馬上感覺到爐火就會烤死了他。和他受百官朝賀的同一個日子，他發出了這樣的『申令』：

『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結爲奸，甚爲同國之公敵，同種之莠民。在國爲逆賊，在家爲敗子，蠱國禍家，衆所共棄，國紀具在，勢難姑容。予維有執法以繩，免害良善。着各省文

武官剴切曉諭，嚴密訪查，毋稍疎忽！』

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又把人民的反抗人物叫做『好亂之徒』，叫做『奸』，叫做『公敵』，叫做『莠民』，叫做『逆賊』，叫做『敗子』；又把革命叫做『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而把反革命叫做『全體國民之公意』。但是，這個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在人民的反抗面前，是表現如何的胆怯呀！他既把自己放在爐火之上，而又怕被爐火烤死。但已經把自己放上去，烤死也就是必然的命運了。

稱帝是袁世凱權威的最高點，又是袁世凱權威的最低點。這個大地主大買辦的政治冒險家打算經過稱帝更高地集中無限的權力在其手，但却因此大踏步地瓦解了自己手裏的權力。他在集中一切權力的過程中，同時又逐步地集中了一切反對自己的力量。前幾年，一切反動派、改良派和帝國主義者把袁世凱當成秩序的救主，現在却認爲袁世凱

這種稱帝的手段即將很迅速地破壞那業已由袁世凱建立起來的秩序，而原來的清朝復辟派，則在袁世凱的旁邊揶揄竊笑。如上所述，梁啟超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中，已深深地嘆息袁世凱將因此一蹶不振。梁氏給他的黨徒的書信中，更毫不遲疑地指出：『此人則既耆矣，路易十五，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既無可逃，所爭者早暮已耳。』因此，原來積極擁袁者，爲着『自存』，現在也變成了積極反袁者。

袁世凱的太上皇——外國帝國主義者也深感袁世凱行動的冒險。當籌安會開始出現的時候，英國人辦的上海『字林西報』，八月二十七日的北京通訊，這樣寫道：

『……袁氏之得以鞏固其地位者，多賴外人精神上、財政上之助力，外人於此又烏可無言耶？數年來中國危亂之際，外人勢力影響於中國事者，其功甚偉，難以盡述。就事實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權力，以造福於國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時局，則非此間多數歐人所敢信者也。不獨信其不能改良時局，且恐時局反因此而愈惡！蓋外人知國人對於袁氏計劃，必有激烈之反對，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長子入繼大位，果能較國民心目中所已信任之代表更爲安穩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

大家知道：日帝國主義是袁世凱稱帝的主要積極鼓唆者。但當帝制運動發展之後，

它就直接向袁世凱政府勸告，應該中止自己的冒險行動：

『外觀雖似各地對於帝制之實現，反對不甚激烈，實則，反對之感情廣爲醞釀，不安之形勢深漫於各地。回顧袁大總統過去四年之間施設，已使國內秩序漸復，地方不安之狀態亦逐日消滅；大總統若維持現狀，無改已採之方針，則秩序全行恢復，各地歸於安寧之日，蓋不甚遠。然今大總統如有突建帝制之舉，則上述反對之形勢或將立成，惹起意外之擾亂，使已形平靜之各地再成危險不安之域。在世界形勢有如上述之今日，目睹中國將發生此種危險之情況，帝國政府鑑於世界大局之利害，不勝憂慮。』

『……帝國政府本防禍未然、維持東洋和平之衷心，茲對中國政府先告以中國今日之情況最堪憂慮，敢問果自信不致發生異變而得平穩實現帝制耶？帝國政府既已坦率披瀝其所見，決以友誼，勸告大總統善顧大局，延緩其變更國體之計劃，以防禍未然，而固遠東和平之基礎。此乃最賢明之措置。』

但是各個帝國主義者制止袁世凱的冒險已來不及了。袁世凱雖然對他們忠心，到這時候，和梁啓超的進步黨人同樣，他們知道袁世凱已經再沒有希望維持他們所需要的秩序，他們只好以惋惜的心情，拋棄了袁世凱，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且積極地幫助了梁啓超、蔡鐸等人到雲南去進行反袁的運動。

人民的反袁運動，有它的弱點。辛亥革命之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離開了人民，失掉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政治信任，雖然他們繼續參加了反袁的運動，帝制發生的時候，並有過一些積極的行動，但是他們不論在實際的政綱上、在實際的政策上、在實際的行動上，却沒有明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東西。他們的政黨——如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華革命黨——雖然企圖恢復同盟會的革命傳統，但却只成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宗派團體，而和人民羣衆沒有真正的聯系，不能成爲人民的首領。至於無產階級，因爲辛亥革命和歐洲大戰，中國工業有新發展，這無產階級就逐步壯大起來，但是，它還不夠壯大到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還不夠壯大到成立自己的政黨，因此，就還不能成爲反袁運動的領導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雖則一方面，反袁運動有極廣泛的統一戰線；但另一方面，反袁運動却缺乏人民革命的主流。運動是廣泛的，但却是自發的多。梁啓超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力爭反袁的領導權。按照梁啓超自己的話，就是：『當此普天同憤之時』，自求『樹立』起來。

袁世凱決心不顧一切，和反抗運動競走，看誰走在更前面。十二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請』設立大典籌備處，而事實上在九月間已由朱啓鈴周自齊等人組織起來。二十一日，袁世凱封了龍濟光張勳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位。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爲洪憲元年元旦，預備登極。當進行籌備登極的時候，袁世凱的命令是：『籌備事宜，務以簡略撙節爲主。』『不尙虛文，重惜物力。』但據十二月二十七日『申報』所載：大禮費預算草案，其總數已定爲五百九十餘萬元。有一本書叫做『袁氏盜國記』說，洪

憲中謀帝用費，可列出的，數在六千萬元，實數真未可臆斷。據民國五年九月六日『申報』所載北京電：財政部調查帝制耗款，實數達六萬萬元有奇。你看！這就是袁世凱所謂『用副歸真返樸、軫念民生之至意』呵！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反袁派起兵了。蔡鍔當了反袁軍的總司令。雲南的力量並不大，但是，按照全國的人心，袁世凱的失敗是注定了。當時英國人辦的京津『泰晤士報』社論『袁世凱之前途危險』一文，刻劃出了自己帝國主義的心理，同時，也刻劃出了袁氏之無可挽回的命運：

『無論勝敗如何，袁世凱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國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不識取勸進之時機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當是之際，不受帝位而堅辭，吾知袁氏對內對外之威望，定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淪陷於力爭帝位之地位（原註：帝位者非人民奉之袁氏，乃一班徇私官僚奉之袁氏者也），雖常人對於袁氏，未嘗不望其保有威權，以成中國現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為帝，以致再生內亂，能勿覺其為值太大，而於國家無所裨益耶？』

帝國主義者對於袁氏的必然沒落，是這樣『三嘆有餘哀』的。

袁世凱在反抗的烽火業已舉起之後，繼續反覆地以『民意』的名義討伐反抗者。他說：『主張君憲，正為我國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時，概聽人民自由，並無絲毫

限制。……不知君主立憲，既經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一二私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翻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爲是非取舍之標準？無可爲準，任聽人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此時元首所以見信於國民者，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爲恪遵民意……夫共和元首，國民已有相當之敬禮，何況今日名分已定，天澤凜然，正宜嚴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一方面說得多末『民主自由』啊！一方面又皇帝的臭架子十足。這末卑鄙！這末下賤！這末醜惡不堪！

民國五年，一月五日，袁世凱又發出了申令，認爲『天生民而立之君』，而且只有他有治國的本領，沒有非分的慾望。他又這末地描寫了反抗者：

『民國成立以來，暴亂之衆，狂妄之徒，各趨於權利之極端，爲非分之希望，或逞強力，或飾巧言，百計經營，務償厥志，意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願。其次即暫據一隅，猶足慰情聊勝。至於何以撫輯人民，何以統治軍旅，何以因應外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盜賊，惟利是圖，固無論矣；即號爲有政治思想者，但憑心理之偏倚，不顧事實之利害，鑿空響壁，大言炎炎，按之毫無實際。夫美錦尙不可以學製，願可以億萬生靈，供其輕心試驗乎？……人民無罪，未可舉全國之重，任人試驗，實偏處此，無從諉卸……。」

當然還是一套老調子。億萬生靈只准許供他試驗。四年之間，他試驗的東西可真多

了：一會兒內戰，一會兒五國大借款，一會兒由臨時大總統到正式大總統，一會兒解散國會，一會兒大捕大殺反對派，一會兒臨時約法，一會兒總統法制，一會兒終身總統，一會兒簽訂二十一條，一會兒『國民代表大會』，一會兒大皇帝……這一切的試驗，由他說來，都是叫做『拯救生靈，保護祖國』。但是，他決不能『任人試驗』，激烈的分子既同於盜賊，有政治理想者又毫無實際，他們都是野心家，如果一經他們試驗，由他說來，則都叫做『塗炭生靈，顛覆祖國』。於是，他在這同一天，再發出了申令，對於起義反抗的軍隊，實行『一體嚴籌防剿，毋稍疎忽』。二十五日，又申令着『各將軍及統兵大員分途進剿，以保地方而奠生靈』。當袁世凱的先鋒的，就是後來著名的賄選大總統曹錕。

可是，袁世凱不『進剿』則已，一進剿就出現了更多的反袁軍。不久，又這一省獨立，又那一省獨立，袁世凱應接不暇了。『登極』的日子只好延緩下去了。

袁世凱本來向他的太上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誇口：『意外之亂，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付之力。』袁世凱不但對於他在全國的地位的估計，是幼稚的，而且對於他和他的太上皇之間的關係的估計，也是幼稚的。他沒有充分地估計到：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如果看到他維持秩序不中用的時候，爲什麼一定還要他呢？爲什麼他們只要扶一個兒皇帝，而不可以多扶幾個兒皇帝呢？袁世凱原來預備以重要權利給日本，作爲日本承認帝制的條件，派了周自齊作爲到東京的特使，日本已

經表示歡迎，可是，忽然加以拒絕了。當時梁士詒即嘆息地說：『周自齊不能去，帝制不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決心拆袁世凱的台，以便扶持另一些新傀儡。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截了當地說：『原來貴政府欲改帝制，本係保證無亂，今明明雲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制，無視友邦勸告，則中政府之責任甚大，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袁世凱挨了他的太上皇這頓毫不客氣的打擊，敗喪極了。軍費又在迫着他，美國的資本家雖然有願意應借的，但是『洪憲』名義的信用却不足，而日本帝國主義也盡力阻止他這條借美債的路。袁世凱原來改在二月間登極，這樣，又只好作罷。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凱命令撤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仍然叫中華民國年號，並在命令中，仍然自稱爲『本大總統』。你看！他本來認爲『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爲恪遵民意』，現在他却不再恪遵他的『民意』，而毫不知羞地要『再維持共和』了。

袁世凱的兩個大部下——馮國璋和段祺瑞，原來對袁世凱稱帝，是採取消極的態度的。梁啓超所能夠感覺到的這種稱帝的危險，馮段當然也能夠感覺到。並且，帝制之後，大皇帝的位子只能交給他的兒孫去世襲，而他們却是希望世襲袁世凱大總統的位子。反人民的大獨裁者原來對於他這兩個大部下的權力，仍然是吝嗇給予的。馮國璋在南京替袁世凱看江山，可是袁世凱並不放心，馮國璋的新夫人，便是袁氏派去替他作特務的。段祺瑞當袁氏的陸軍總長，可是，袁世凱却另設了『海陸軍統率辦事處』，以

削弱他的權力，又另組了『模範團』以削弱他所支配的隊伍，而當帝制運動發生之後，袁氏且索性免了他的職。當袁氏這四面楚歌的時候，馮國璋便在南京採取中間態度，一方面與袁世凱周旋，另一方面與反袁軍周旋，以便操縱其間，使自己形成爲時局的重心。段祺瑞則在袁世凱苦悶之下再度出山，利用袁世凱的危機，用各種要挾，敲出袁世凱一些權力，由他組織了『責任內閣』，以便逐步地把段祺瑞的政權代替袁世凱的政權。有其師必有其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時候對付滿清朝廷所使用的權術，馮國璋段祺瑞在這時候，也用來對付袁世凱了。

有一些昨天還在袁氏面前稱臣稱子的人，今天也馬上變成『亂臣賊子』了。又正如嚴復所說：『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盡則交亡。』袁世凱既這樣對待他的部下，他的部下當然會這樣來對待他。十年之後，有一個號『蕉鹿客』的，論述當時袁氏的情況，寫道：

『陸榮廷於領餉之後，遽應西南，陳宦於俯跪稱臣，領川任後，亦一電來請退位，此其時也，袁之聲色均廢，於電文譯呈之後，汗流浹背，目眩頭暈。其愚爲可憐，其情亦爲可憫。』

袁氏生命就於這匆促間鑽進了棺材（六月六日）。當然，袁氏之愚並沒有什麼可憐，其情亦沒有什麼可憫。袁世凱政治的邏輯，引導袁世凱必然走到這末的結局。

袁世凱——這個反人民的大獨裁者，依靠外國反動派援助，依靠武力，依靠陰謀，

依靠金錢，依靠欺騙，依靠假『民意』，一朝權在手，荼毒人民，統殺自由，無所不用其極，以爲天下莫予毒也已，但如今安在哉？

只有人民是永遠不死的。

六

袁世凱倒了。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運動本身，並沒有解決那產生『袁世凱』這個政治觀念的社會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反袁的勝利並沒有變成人民勝利的結局。運動的弱點既如前面所述，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去做這種解決，而無產階級又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由農民所組成的反袁的軍隊是掌握在投機的改良派和反動派手裏。他們所搞的，仍然是旦夕間翻手爲雲和覆手爲雨的勾當。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所掌握的武裝是弱小的，而且不是從人民運動中生長起來的人民武裝。它的力量寄托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中國內部矛盾的援助上面（如山東的所謂『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依靠日本的直接援助），而不是寄托在中國人民的援助上面，因此，就絕對沒有可能有什麼真實的成就。反袁之後，武裝依然是軍閥的武裝，政權依然是軍閥的政權。人民依然被踐踏在軍閥的武裝和政權的足底下。袁世凱集中的軍閥權力，變成分散的軍閥權力。事實上，當他把軍閥權力集中到最高點的時候，便已注定了這種軍閥權力之不可避免地由集中到分

散。袁世凱還沒有死的時候，便已不可能挽救這種由袁世凱集中自身所造成的分崩離析的局面。袁世凱之死，只是這種變化局面的一個插曲而已。梁啓超原來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這是不錯的。但人民的革命洪水不是在袁世凱死後就馬上奔湧而來，而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相伴隨——還需要一個時間的積蓄和醞釀。人民嘗了滿清朝廷統治的經驗，嘗了袁世凱統治的經驗，但還需嘗一嘗袁世凱餘孽統治的經驗。

袁世凱這個北洋軍閥系統原來所包含的皖系與直系分裂的種子，在袁世凱死後，就日益表面化起來。先是表現爲段祺瑞與馮國璋的矛盾，隨後更公開爲段祺瑞徐樹錚與曹錕吳佩孚的矛盾。原來在袁世凱下面，而於皖系直系之外自成一系的宣統復辟派——辦子軍頭子張勳，於袁世凱死後不久，曾驅走繼任總統位子的黎元洪，演了一幕復辟的醜劇。但皖系段祺瑞於同意後又背約，十來天功夫，張勳這系勢力就被瓦解了。山海關外異軍特起而爲北洋派別支的奉系，則逐步形成獨立的勢力，以與皖系和直系的勢力相抗衡。

黎元洪在袁世凱死後當了大總統，實際權力是在皖系段祺瑞手裏。袁世凱所解散的國會，又召集起來（民國五年八月一日），但被段祺瑞張勳因參加世界大戰問題所脅迫而宣告第二次解散（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張勳復辟事業（七月一日到十四日），利用這個機會幹起來。戊戌的君主立憲派在復辟的醜劇中，實行了分裂：康有爲在張勳一邊，梁啓超在段祺瑞一邊。張勳失敗了。直系馮國璋以原來『國會』所選的副總統資格

繼任黎元洪，段祺瑞又做了國務總理。段祺瑞藉梁啟超黨人（此時稱為研究系）合作，另行選舉新國會（民國七年八月開幕）。研究系雖然賣了力，但這『新國會』却以段祺瑞的直接御用黨——安福系為名，叫做『安福國會』，而研究系議員在成百個議員位置當中，不過有寥寥十幾個人做陪襯而已。馮國璋被段派所排擠，安福國會選舉了袁世凱的心腹伙伴、北洋派元老、但沒有直接軍權的徐世昌做總統，以便於段派的操縱。國民黨和南方的軍閥官僚合作，要恢復舊國會，進行了所謂『護法戰爭』，而段祺瑞則師承袁世凱，堅持貫徹專制統一的政策。南方反對北洋軍閥——當時中國反動勢力的中心——的『護法戰爭』，在某方面說來，也有一定『進步』的意義，但因爲和人民脫離，就被人民所冷淡。

袁世凱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總工具。袁世凱死後，各個帝國主義各自找尋其得力的工具。代表各派大地主大買辦的各派軍閥的鬥爭，其背後乃是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爭權奪利的鬥爭。皖系與直系鬥爭，背後實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在華的鬥爭。皖系段祺瑞徐樹錚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表現了無微不至的忠心，向日本大借款，得到了日本的武裝，組織所謂『參戰軍』，由日本軍官訓練，實際上是爲的『掃蕩』反對勢力，進行專制統一。段祺瑞並與日本簽訂了所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八年二月），在日本直接鼓動之下，參與了干涉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直系和南方軍閥則得到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以便削弱皖系的勢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在巴黎和

會的失敗，激起了全國人民反日反段的運動。袁世凱死後，第一次人民的洪水真正湧出歷史舞台了。這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直系軍閥吳佩孚等以曹錕爲首領，利用了當時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緒和助力，並聯合了奉派，於民國九年七月間，一舉打敗了皖系。從這個時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政府取得了權力。曹錕吳佩孚又師承了袁世凱和段祺瑞，挾『中央』以令諸侯，堅持貫徹專制統一的政策。

曹錕吳佩孚一方面繼續和南方作不調和的戰爭，另一方面和奉系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這時候，孫中山在廣東依靠舊國會的一些議員組織了『非常國會』，當非常大總統（十年五月五日），進行和東北張作霖聯合的政策，以反對曹吳。十一年四五月間，第一次奉直戰爭爆發，奉軍打了敗仗。這事件進一步地誘發了曹錕吳佩孚壟斷全國權力的慾望。於是，吳佩孚於五月間採取了恢復舊國會（被叫做『恢復法統』）的口號，目的是一箭雙鵰：一方面迫得徐世昌下野（因爲他是『新國會』選舉的），另一方面也使得孫中山的地位失却根據（因爲他本來是以『恢復法統』也即恢復舊國會爲號召的），以便把曹錕抬上最高權力的座位。果然吳佩孚這一謀略發生了效力：徐世昌退位了。孫中山被他的幾個和直系勾結的部下——陳炯明等所逼迫而蒙難，離開了廣州。直系軍閥利用黎元洪作爲過渡的總統。曹錕吳佩孚到處高壓民衆，而以十二年二月七日慘殺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工人，爲歷史上最大的罪行。十二年六月間，直系軍閥進行了『逼宮』，驅逐黎元洪。其中參加的，不但有軍警，而且也還有『公民團』。十月五日，五百幾十

個國會議員們每人得了五千元的銀行支票，於是這個袁世凱的舊部下曹錕「獲選」了大總統。這個選舉曹錕做總統的國會，依然是十年前選舉袁世凱做總統的國會。這真是歷史絕妙的諷刺。「豬仔國會」、「豬仔議員」——這種稱呼，就此變成了全國所咒罵的通俗的稱呼。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國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完全的、最後的無恥破產。

曹錕吳佩孚爬上權力的最高點，正如他的老師袁世凱的經驗，注定了他們權力很快跌下來的命運。全國人民湧起了反曹吳的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了這人民運動的先鋒。各反對派軍閥利用了人民反曹吳的情緒（正如吳佩孚當年利用了人民反段祺瑞反安福系的情緒一樣），和曹吳對抗；而曹吳則利用了「統一」的口號，要削平他們。十三年九月間，爆發了蘇浙戰爭。接着又爆發了第二次奉直戰爭。直系雖然在蘇浙打了勝仗，但在北方，却出現了馮玉祥的倒戈。橫行一時而自以為武力天下無敵的直系軍閥，土崩瓦解。曹錕變成了階下囚，吳佩孚變成了流浪漢。

差不多每一派北洋軍閥的首領，都更番地爬上了權力的極峯，而每一個都從那極峯跌下來，結束了他自己。曹吳失敗後，段祺瑞又稱「執政」及其後北洋派種種的歷史，這些已經都是北洋軍閥統治的餘波。在人民怒潮的沖擊之下，北洋軍閥已是日暮途窮的了。

忘記了戊戌政變時候袁世凱的叛賣、初為袁世凱服務、而反袁之後又為段祺瑞服務

的梁啓超，對於袁世凱曾經這末寫過：

『袁氏自身……以爲一切人類通性，維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被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窘蹙之，使其不能自存。當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自植其勢力……及其爲總統，乃益煽而揚之。……』

袁氏這種政策，其實乃是近代中國一切反人民的獨裁者通用的政策。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特產的政治或政治的特產。白刃與黃金——也卽威脅與利誘，這是大地主大買辦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權術與特務都必須依靠這兩項的東西運用起來，而其外國的主人則是這類工具的供給者。袁世凱及其政治的後裔『挾此二物以臨天下』，荼毒人民，戕害正義，其罪惡真是無限的。而由於人民運動的發展，袁世凱的政治後裔所採用的手段，比起袁世凱就更爲殘酷，更爲陰險，更爲善於作假。

袁氏及其後裔都有一種所謂『正統』的觀念，認爲他們的統治系統乃是代表中國的正統，認爲中國必須在他們這種『正統』的口號下實行『統一』，而不能由人民的民主主義去實行統一。民國七年，段祺瑞曾向北洋軍人發出一個密電，說他『……私冀發揮我北洋同胞之實力，統一國家，奠寧宇內，庶幾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得實施。』又說：

『我北洋軍人分裂，即中國分裂之先聲；我北洋實力消亡，即中國消亡之朕兆。』『伏願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爲念，團結堅強……』段祺瑞認爲北洋派即中國，沒有北洋派便沒有中國。這是代表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的『正統』觀念。民國十六年叛賣革命的新軍閥代替了北洋軍閥，新軍閥的獨裁代替了舊軍閥的獨裁，這種反人民的『正統』觀念又在新的獨裁者、新的統治者用另一種新形式表現出來，以表示他們有用『統一』的名義來絞殺人民運動的權利。

毛澤東同志『論聯合政府』指出：『必須將分裂的中國變爲統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同志主張人民的正統，人民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設問道：『但是如何統一呢？獨裁者的專制的統一，還是人民的民主的統一？從袁世凱以來，北洋軍閥強調專制統一，但是結果怎麼樣呢？和這些軍閥的志願相反，所得的不是統一而是分裂，最後是自己從台上滾下去。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十年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嵋山。現在又在山上大叫其專制統一論，這就叫給誰聽呢？難道還有什麼愛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願聽麼？』歷史的教訓就是這樣的。

中國人民運動，中國歷史的前進，因爲袁世凱及其政治後裔——這類大獨裁者的阻力，經過許多曲折的痛苦。是的，中國人民及其世世子孫是永遠不會忘記這種充滿了血和淚的痛苦。

但歷史前進的規律終究是不可阻止的。自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和民國十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中國歷史開拓了完全嶄新的時代，這是真正的人民的『洪水其來』的時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是中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建設了自己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總結了百年來人民鬥爭的經驗，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規定了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和民衆運動的政策，使人民獲得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奮鬥的新步驟，發動了廣大的新形式的羣衆運動。這極大地鼓舞了民主派孫中山的革命熱忱，而且這種政綱和政策爲孫中山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派所同意。孫中山在許多失敗、挫折以及妥協的錯誤的長期經驗過程中，從此找到革命的新道路，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偉大三大政策，因而改組了國民黨，形成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孫中山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從舊民主主義走到新民主主義。這國共統一戰線就進行了第一次的中國大革命。北洋軍閥統治的時代，就是在這一次大革命中間終結了的。

在國共合作的問題上，孫中山衝開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阻撓和譏諷，表現了不顧一切的偉大的革命英雄氣概。這是孫中山革命民主主義最高的昂揚。這是孫中山的所以不朽。

是的，歷史出現了極不幸的悲劇。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國主義，把

無量數的人民納在血海裏面，建立了新軍閥統治的朝代——大地主大買辦統治的新朝代。『袁世凱』穿了新裝復活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被踐踏在足底下。新袁世凱重覆了而又千百倍地發展了舊袁世凱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權術，其手段，其政策，其口號。新袁世凱所給中國人民的痛苦，引出中國民族的新災難，是不可計量的。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舵手——毛澤東的領導下，却超越一切險阻而前進，不屈不撓地爲解放而鬥爭。十年內戰，八年抗日戰爭，中國人民經過自己史無倫比的流血，已創立了不可戰勝的基礎。中國民族必將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最後戰勝一切阻止前進的敵人，而頂天立地站起來，這是沒有疑問的了。

中國人民的勝利，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在中國的終結，這就是袁世凱的政治及其政治觀念的終結。

讓袁世凱這樣可恥的反人民大獨裁者永遠被人民所唾罵吧！

讓各種形式的袁世凱政治制度和袁世凱政治觀念在新民主主義的面前永遠死亡吧！

在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旗幟下，在毛澤東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旗幟下，中國人民勝利萬歲！

後記

這個小冊子根據的材料，有白蕉編著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謝彬著的『民國政黨史』、『黃遠生遺著』、王芸生編著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李劍農著的『中國政治史』等書。主要的材料見之於『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爲免累贅起見，文中所引材料，不再一一登記出處。

一九四五年九月

竊國大盜袁世凱

著者 陳伯達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上海河南路十七〇號
上海河南北路五九號

1949年7月 1-15,000(滬)

BC
27.52